

我的证词

—— 关于印尼 9.30 事件

苏班特里哟 博士

(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情报部长)

庄民兴 丘美璋译

目录

- 一 引言
- 二 序
- 三 第一章：9.30 事件序幕
- 四 第二章：受操纵的运动
- 五 第三章：权力易手
- 六 后记

一 引言

众所周知，记述一件历史事件是多么困难和繁琐的事情，因为它有别于数学；而任何记述一件自己所见所闻，甚至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事件，免不了会夹带著作者本人的观点。因此，从什么角度和什么人的利益写这个历史事件，就会产生多种不同说法或版本。但是，作者又无论如何都要表明他费尽心血分析的历史事件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无倾向性的”等等。

同样的道理，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中那黑暗的一页，即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大悲剧，对其作出的记载和证词亦是如此。由于那场悲剧蕴涵着政治因素，对历史的分析显然也就存在政治利益。首先是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当权者不仅控制和垄断史料，以便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它当成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合法工具，以至在新秩序军政权时期，对于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历史大悲剧，即著称的“9.30事件”（后又改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的9.30暴动”加以“完善”），从其序幕直至尾声的史料记载，都免不了体现新秩序执政者军人集团的政治目的。因此，自从新秩序军人集团执政以来，“历史事实”只有一个，既是新秩序执政者提供的史料。1994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秘书处出版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的9.30暴动”一书被指定为“官方书籍”，即“必修书”，继而成为撰写一切有关9.30事件的参考数据和教学数据，被认为是唯一准确记载9.30事件的书。

当前，在目前全面改革年代里，凭借权力“操纵真理”已经毫无立足之地，社会上从此涌现出许许多多有关“9.30事件”的丛书。这些当然不同于新秩序当权者出版的“官方书籍”甚至与“官方书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对人们认为“不正”的或者被新秩序“歪曲”的历史记述就产生了通常所说的“纠正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对于“纠正”和“歪曲”的理解也离不开个人主观见解。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交给社会大众，尤其是历史观察家们和学者们，由他们去评判哪些是“歪”的，哪些是已经得到“纠正”。

与此同时，口述习俗作为处在比较落后或尚在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特征，仍会在群众中存在。即使在自认为有文化的人群中，读书的习惯，尤其写作方面都还比较薄弱，这就导致我们民族的历史面貌越来越伤痕累累，只能一千零一夜神化故事那样成为口述流传的“故事”。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肩负提高教育的使命，在投入为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为了更广泛地提升广大群众有见地的觉悟，我们有意识地运用过去未能出版，以复印件形式传阅的书稿，把它重新打印，排版印刷，使广大群众拥有它并得于阅读它。当然这不意味着“垄断真理”。相反，是让读者能以批判的眼光达致寻得真理。

本书内容与复印稿件一模一样，只是排列顺序和字号稍作变动，重印后比较薄些造价会便宜些。除了编者认为有误的字句作了些更正外，本书没有作其它任何改动。

但愿我们奉献的这本小册子对扩大我们的视野，尤其丰富我们本民族的历史有帮助。

2001年3月11日 于雅加达

二 序

自从新秩序政权倒台后，许多著名记者及作家纷纷前来找我，围绕 9.30 事件要求采访我，但我均以“时机未成熟”谢绝了。现在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这是出于我对编辑的信任。他常来我家要求采访，这过程是他通过我的讲话录音再作采访以资完善，我祈求上帝的恩赐。

其实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数据时已年届 85 岁，我在世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我于 1914 年 9 月 15 日出生于东爪哇省玛朗市 Kepanjen 县，如今在有生之年，我正在为自己积德行善，以便将来去见真主。

我不断受到战友们的催促，要我利用余生做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作为精神食粮提供给接班的一代人，尤其纠正被新秩序掌权者歪曲了三十多年的有关 1965 年 9.30 事件的历史，比如 1994 年由国家秘书处出版的，充满虚假的有关上述事件的书籍。

在上述事件中，我不仅经历了那段历史的部分，而且还是那段历史中的一个角色。我当时是在位的国家高级官员。当年（1965 年）我兼任三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即第一副总理，外交部长和中央情报部长。尽管如此，后来我被随后篡得国家政权的执政者所迫害。我是属于同一代知名人士中少数能活到今天得以长寿的人之一，谢天谢地。

我在狱中经历了三十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雅加达的芝比囊（Cipinang）监狱度过的。在那里我有机会与被指控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士在一起，如拉迪夫上校（Kol. Abdul Latief）及其同伴。我也曾在万隆芝玛虚（Cimahi）监狱与翁东·山苏里中校（Letkol Untung Samsuri）关在同一监牢里，他是 9.30 事件的领导者。翁东是于 1966 年在万隆市郊外被处死的，在翁东被处决之前，工作人员告诉我，下一个将被处决的便是我。但是，对我的死刑判决，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不同意，因此，谢天谢地，我还能活到今天。

当然，我经历过的事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这事件不仅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历史，而且也是我个人活生生的经历。同时，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均很适合作为写这本书的材料。

终于我认识到战友们建议我围绕 9.30 事件编写成书的确切必要，我必须为印度尼西亚年轻的一代留下一些东西，使他们不要再中新秩序掌权者遗留的，已经被歪曲和伪造的历史的毒。新秩序掌权者歪曲和伪造历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他们既得权利得到永恒，但由于民主改革者的行动，最后他们垮台了。但是，无论如何，年轻一代必须了解我在那个年代亲身经历的有关 9.30 事件的真实情况。

我写这些仅仅是想实现真主行善弃恶的训诫，纠正被歪曲的事实，这是我奉献本书的首要目的。

苏班特里哟（Dr. H. Soebandrio）

2000 年 9 月初 于雅加达

三 第一章：9.30 事件序幕

阵营间的矛盾

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属于不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欢迎的国家。在那个冷战年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以美国为首）和共产主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为首）之间的矛盾，美国正准备向北朝鲜派遣几十万部队消灭共产党。那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属于合法政党，当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仇恨达到高峰时，便终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苏加诺总统强硬地作出了响应：“让你的援助见鬼去吧！”作为一个相对刚刚诞生不久的国家领导人，他发布了很具胆略的方针政策：“自力更生”。

很明显，苏加诺总统这个态度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天然资源非常丰富——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石油，加里曼丹茂密的森林，伊里安的金矿，以及未探测到的，可能隐藏着丰富天然资源的上千个岛屿。所有这些，我们民族还没能力开发，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一亿多人口的潜在市场，以至印度尼西亚大有可能有一天不用西方援助也会繁荣昌盛起来。由此启发了苏加诺总统采取对抗的姿态：“打倒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苏加诺总统表示，印度尼西亚只需要具备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青年。

最后美国的态度也变得明朗：推翻苏加诺总统。美国的这一态度也得到其盟友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自从美国停止援助后，他们进而与印度尼西亚军队各派别建立联系，他们装备和训练了印度尼西亚军官和部队，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带动的情报活动，煽动军队破坏苏加诺总统。1956年11月的政变图谋，印度尼西亚陆军副参谋长卢比士(Kol. Zulkifli Lubis)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然而政变阴谋被粉碎了。后来北苏门答腊军队企图接管政权，也失败了。军队靠美国提供的援助，似乎找到了破坏苏加诺的机会。虽然美国还在继续策划企图推翻苏加诺总统，但是苏加诺仍然有能力控制局面，因为许多军官非常忠于苏加诺。

遗憾的是，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政治格局并不稳定。苏加诺总统十分努力创造稳定的局面，然而情况非常复杂。其中有三种要素控制着印度尼西亚政局。

- 1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实力要素
- 2 印度尼西亚国军（陆军）实力要素
- 3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力要素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实力要素，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总理，伟大的革命领袖及终生总统，就是人们亲切称呼加诺兄的苏加诺工程师。两项人民命令内阁成员也属于这个实力要素。

印度尼西亚国军（陆军）实力要素包含两个阵营：亚尼阵营（印度尼西亚国军中将Ahmat Yani）和纳苏帝安阵营（印度尼西亚国军中将Abdul Haris Nasution）。起初苏哈托也属纳苏帝安阵营，尽管他后来建立了自己的阵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力要素约三百万党员，并得到其下属组织，如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印度尼西亚全国总工会和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委员会约一千七百万成员的支持。照这个数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世界上成为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后的第三大共

产党。在 1957 年大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名列第四位。正如其他大党一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内阁中也有其席位，他们就是统筹部长兼临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议长的艾迪（DN Aidit），还有作为统筹部长兼合作国会议长的鲁克曼（Lukman）和土改事务部部长的约多（Nyoto）。

其实，苏加诺政府从 1952 年 10 月 17 日就开始不稳定。纳苏帝安阵营在南苏门答腊成立了雄牛委员会和大象委员会，这些称之为委员会的组织只是为纳苏帝安阵营争取群众而已。然而，他们公然宣称自己是政府的手，首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喜欢看到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亲密关系。

纳苏帝安阵营的活动不限制满足于民间群众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去影响军队，让军队也参与支持委员会的活动。纳苏帝安作为军队高官，要这样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其中的手法是，利用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组建积极参与政治的民族运动阵线。这就导致军队开始介入政治活动，日后由新秩序延续下去。另一方面，纳苏帝安阵营为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组建了包括青年，政党，农民参与的合作机构，并在印度尼西亚国军（陆军）的保护伞下与军队结为一体。

当时我就断言：这是区域级（因为利用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直至农村级（让农民卷入）的战争论。

因此，一个计划周密，诡计多端的反政府活动周全了。据我的情报部门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背后支持纳苏帝安。

苏加诺总统后来察觉到这个反政府活动，他知道政府正受到威胁，他也清楚罪魁祸首就是纳苏帝安。因此，苏加诺便直接击中问题的要害，采取措施限制纳苏帝安的作用。虽然纳苏帝安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职务仍保留着，但其作用已受到限制。苏加诺安排纳苏帝安管理部行政事务，禁止纳苏帝安参与和军事行动有关的事务，这就意味着把纳苏帝安关进“笼子”里。

与此相对应，苏加诺总统提拔亚尼中将为陆军总司令，其正式任务是领导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陆军）。此外，苏加诺赋予亚尼特殊使命，牵制纳苏帝安阵营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一种情报活动，最后导致纳苏帝安和亚尼的关系恶化。

自从亚尼被提拔，纳苏帝安和亚尼之间矛盾产生，但起初还没有表面化，只有政界上层了解真实情况，但是，后来亚尼调整了一些军区司令，当人们知道那些被更换的军区司令是属于纳苏帝安手下的人时，真实格局明朗化了。

以上是军事部署方面，苏加诺总统和第一副总理苏班特里哟博士（我）一起，由武装部队参谋长调整为总统顾问。以上发生于 1963 年末。当然，纳苏帝安必须服从总统的命令，他没有任何理由“违抗”。当纳苏帝安与亚尼的关系日益紧张时，军队内部担心会发生分裂，如果纳苏帝安采取反叛行动，肯定得不到下属部队的支持，纳苏帝安肯定已仔细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这是纳苏帝安服从的原因。

苏加诺的下一个步骤，即铲除纳苏帝安阵营的残余势力，其中 1964 年初，解散和改组国家机构委员会（即纳苏帝安组建的反贪委员会）。作为替代机构，苏加诺成立了

由他的亲信苏班特里哟博士（我本人）领导的改组革命机构最高指挥部，并任命亚尼为该组织的参谋长，以便加强领导。

以苏加诺的前景看，亚尼和纳苏帝安之间关系破裂是一种胜利，尤其后来撤消了纳苏帝安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并把他关进“笼子”里，因而纳苏帝安曾经制造的“国中之国”的局势变得脆弱了。

看到这种局面，武装部队将领们很是顾虑，他们担心纳苏帝安和亚尼的矛盾会蔓延到基层的士兵。这局面一旦产生，后果肯定是致命的。这种担忧后来被反映到总统那里，因此，苏加诺总统委派几位高级将领，包括苏哈托少将和中爪哇军区司令巴苏吉·拉赫玛德（Basuki Rahmat）见纳苏帝安。他们的任务是要纳苏帝安适应苏加诺总统已经制定的路线方针，不要有违抗行为。

这两个互相矛盾的阵营基本上均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虽然亚尼站在苏加诺一边，但亚尼不喜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与苏加诺有密切关系。当时苏哈托被指派为纳苏帝安和亚尼的调解人，但他倾向于纳苏帝安一边。

实际上纳苏帝安和亚尼的矛盾是不容易调解的。1965年某一天，在陆军总部一个十二位陆军将领应出席的重要会议，纳苏帝安和亚尼本当应邀出席这个会议，但他们两都缺席了，而由各自的顾问代替他们出席会议。本来召开这个会是为了调解纳苏帝安和亚尼的关系，结果该重要会议没有达到其首要目的，因为冲突双方均缺席，而均由各自的代表出席会议。

1965年4月中旬又有一个更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在陆军总部召开，大约两百军官出席。在这次会议上纳苏帝安和亚尼也都没有到会。但那次出现了新的主义，称为：三项特别魔力，倡导者是苏哈托，其核心内容是陆军三项忠诚诺言。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但其要点如下：印度尼西亚国军有无限的权力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提出建议和政治任务。这个主义使政界精英和知识界产生新的忧虑，因为如此做法，由纳苏帝安开创的，陆军坚持的“国中之国”政策越来越明显了，也意味着纳苏帝安阵营与得到苏加诺总统支持的亚尼阵营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两面政策

苏哈托是受命去调解亚尼和纳苏帝安关系的军官之一，当时他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无论是纳苏帝安或亚尼对苏哈托都没有好印象，原因是由于苏哈托本人不轨的行为造成的。那是发生于苏哈托还在蒂博尼哥罗（Diponegoro）师任职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蒂博尼哥罗师的时候，苏哈托结识了华人企业家林绍良（林后来得到苏哈托的特殊待遇，成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企业家）苏哈托和林氏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由于他们走私许多货物，苏哈托曾托辞，他们走私是为了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部的利益。走私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当时所有的军官都知道这件事，甚至被揭发出来，他们走私并不是为了军区司令部的利益，而是将所得款项全部落入苏哈托和林氏的私囊。

了解到苏哈托的行为举止，亚尼即刻发怒。有一次，亚尼甚至摔了苏哈托一巴掌，因为他认为走私行为丢了军队的脸。接着纳苏帝安建议把苏哈托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并立即开除出陆军，但受到卡托·苏普罗托（Gatot Subroto）中校的阻止，理由是他认为这个军官还可以教育。后来卡托向苏加诺总统建议宽恕苏哈托，并把他送到万隆陆军参谋和指挥学校学习。

苏加诺同意了，苏哈托就此进了陆军参谋和指挥学校，该校校长陆军准将苏瓦尔托（Suwarto）亦接受了苏哈托。当时陆军参谋和指挥学校不仅传授军事教育课，而且也传授经济和管理课。在陆军参谋和指挥学校学习的军官们起了当“国中之国”理论教师的作用。

因此，当苏哈托受命成为亚尼和纳苏帝安的调解人时，他处于为难境地。亚尼曾经摔他巴掌，而纳苏帝安曾建议撤除他的陆军职务并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但是，苏哈托选择了站在纳苏帝安一边，以至于人们看到的是他是属于纳苏帝安阵营的人。

然而，苏哈托后来建立了自己的阵营。苏哈托阵营的建立始于美国对纳苏帝安的信任开始削弱之际。由于纳苏帝安对“全面斗争约章”叛乱，解放西伊里安运动以及“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起不到积极作用，这三件事使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的利益受到影响，以至于美国对纳苏帝安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在美国眼里，美国与纳苏帝安亲密起初是为了抗衡苏加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软”政策的需要，当美国对纳苏帝安信任度削弱时，苏哈托已成为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阵营。

1965年初在贝尔格莱德印度尼西亚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办公室里，有一封信送交给印度尼西亚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武官约卡·苏卡（Yoga Sugama，后来苏哈托安排他当国家谍报统筹机构负责人），寄信人是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信的内容是征求约卡的意见，是否愿意回雅加达担任新的职务，即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情报部长。这个建议吸引了约卡，因此约卡于1965年2月5日抵达雅加达，并直接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在H. Agus Salim街的家里见面。他们在那里商议，这时苏哈托阵营初步形成。

苏哈托从贝尔格莱德召回约卡揭示了三个迹象：第一，约卡回印度尼西亚没有经过正式途径。从贝尔格莱德印度尼西亚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召回任武官职位的约卡，应该由陆军司令亚尼执行，因为约卡是一位陆军军官。但实际情况是，约卡是由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中将发出信函召回的。第二，约卡被召回国和苏哈托破坏苏加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第三，他们的目的是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三个迹象不是我做的结论，而是由阿利·慕托伯（Ali Moetopo，系苏哈托——约卡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以充满自豪感并直言不讳地披露出来的，阿利以毫无负罪感的姿态披露了这件事。

对苏哈托来说，以这种方式召回一位官员是件平常事，实际上苏哈托已越级，他通过违反纪律的形式建立了他的阵营。苏哈托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完全与陆军司令没有关系，而是关系到国内以及国际政治。这个阵营关注的对象是苏加诺和共产党。

苏哈托阵营也叫苏哈托——约卡——阿利三人小组。往后我称他们为苏哈托影子集团，他们暗地里在一起搞地下活动。当初他们是老朋友，并在蒂博尼哥罗部时就已形成

了一个紧密的小组. 这三人小组紧密的关系在破坏陆军领导选定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计划中已经受考验, 他们的紧密关系到了雅加达后得以延续。

关于苏哈托三人小组紧密地破坏陆军领导计划之事, 经过是这样: 当时陆军领导提名帮庞. 苏伯诺 (Bambang Soepeno) 上校为候选人, 这个提名帮庞为候选人的计划, 后来被那里的军官们知道了, 当时只有中校军衔的苏哈也听到了这消息, 他真不简单, 虽然苏哈托的军衔比帮庞低, 然而他却敢于抢夺军区司令的职位, 他采取的是卑鄙而又隐蔽的手法。

当提拔帮庞为军区司令的计划走漏风声后, 在中爪哇的Kopeng 召开了一个有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部一些军官出席的秘密会议. 这个会议是由苏哈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约卡出面, 而由苏哈托协调召开的, 但是苏哈托本人没有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苏哈托必须出来担任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员, 要不然约卡和苏哈托将组织力量一起拒绝对帮庞的提名。当时提名帮庞为军区司令尚未得到总统的批准, 因此, 企图夺取这个职务的苏哈托必须与时间赛跑。

然而, 实际上苏哈托 (通过约卡出面) 提出的这个方案并没有得到出席会议军官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十几位军官, 只有一位卫生部门的军官苏哈尔迪 (Suhardi) 上校医生签了名, 表示同意或表明支持, 其他军官并没有签名赞同。

约卡起初承认这个会议事先并没有告诉苏哈托, 这可以解释为该方案不是苏哈托提出的。当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部派出的两名代表将要出发去雅加达请求有关提拔帮庞的总统签名时, 这个秘密会议才传开。根据后来约卡的回忆披露, 这个秘密会议, 方案是苏哈托提出的。约卡承认当初苏哈托不知道该秘密会议的召开, 是为了不让雅加达方面怀疑他们组织力量反对提名帮庞, 但这个秘密会议是否通过约卡并由苏哈托协调, 或者是约卡本人的倡议, 这点就没有得到证实。

作为对照参考, 苏哈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阿利表明他当时是突击队队长, 由他帮助约卡进行情报活动。他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情报活动, 但是其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让苏哈托成为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但阿利全然没有说明是谁叫他干的, 是约卡还是苏哈托? 也许是两个人一起叫他干的。

撇开约卡关于秘密会议协调人问题是否在说谎, 但约卡和阿利的一系列说法表明了苏哈托集团的存在, 是搞情报活动的集团, 而苏哈托就是上演皮影戏的幕后操纵者。当然幕后操纵者不用出面。

那些演戏者总算好运, 因为这个集团的意图成功了。帮庞当不成军区司令, 而冒出了一个苏哈托成了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员。这个集团的活动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假如苏哈托当不成军区司令员并且该秘密会议被揭露出来以至于被陆军领导发现的话, 苏哈托将逃脱法网, 他可以轻易地背叛同伙, 因为他没有参加那个秘密会议, 承担最大风险的肯定是苏哈尔迪上校医生。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 1946 年 7 月 3 日苏哈托和他的同伙企图发动政变时就干过类似的事情, 但那时的政变失败了, 苏哈托见风转舵背叛了自己的同伙, 苏哈托以“为保卫国家安全”作为借口逮捕了他的同伙。

这件事我简单叙述如下：1946年7月3日的政变企图是在平民党的丹·马拉加（Tan Malaka）领导下发动的。丹·马拉加请了包括苏哈托在内的中爪哇军界参与，他们想推翻的是夏伊尔（Syahrir）总理。1946年6月20日，夏伊尔总理和他的同伴们在梭罗（Surakarta）被绑架，绑架者是由苏答尔梭诺（Sudarsono）领导的第三师属下的军人集团进行。苏哈托作为梭罗军队指挥官之一卷入了这个绑架案。

1946年7月2日绑架集团共有两个营在苏哈托司令部集合，他们调动部队控制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如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和电讯部门。当天晚上，他们也准备了决议书，解散夏伊尔内阁并重新组阁。这个决议书原定于翌日在日惹总统府由苏加诺总统签署。

决议书内容分四个步骤，总统的决议登在第一，二和三通告，通告内容全倾向政变一方。例如，第二条通告是这样写的：“在第二阶段，根据人民和军队对于为人民而斗争的印度尼西亚革命领袖的敦促，我们以国家元首的名誉宣布，今日停止苏丹夏伊尔内阁的全部工作。1946年7月3日于日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签名”。

但这次政变失败了，所有参与者被捕被押。此时苏哈托见风转舵，他原先和绑架者结成同伙，后来他反而逮捕了绑架集团。他借口说，他成为绑架集团成员为的是作为一种手段来保护被绑架者。

这就是苏哈托的质量，他为此事感到自豪，他不会为他自己见风转舵而感到羞耻。在他的自传里，苏哈托对此事只是一笔带过，他对自己的描述完全与事实大相径庭。早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初期，苏哈托就运用了两面手法。

“将领委员会”的初期

1963年末我以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代表苏加诺总统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受到如此欢迎，也许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一连受到三位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即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和陈毅外长。我们知道他们同情苏加诺总统，加诺兄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赏。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召开，加诺兄的亚非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构思，使他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敬佩，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

我们会谈的中心是：中国领导人愿意为印度尼西亚提供四十个营的军队装备援助。

这是很齐全的装备，从半自动武器，自动武器，坦克到装甲车，真不简单，所有装备全是无偿的，而且是无条件的。

得到此信息，我以总统的名义表示感谢，但我未能当即答复，因为这项援助的接受与否不是我的职责权限所能决定，我必须向总统汇报。所以一回到国内，我便立即向总统汇报，我看到总统不假思索地就表示“好吧，接受吧！”根据我的观点也应该如此。撇开中国向我们提供无偿的武器援助的目的是想得到什么利益不谈，只要援助是无条件的，为什么不接受呢？

苏加诺表明愿意接受中国提供的援助一事，我立即转达给中国领导人，他们听了很高兴，表示即将准备该军事装备，他们并向我们落实具体时间，何时可以运送。我即向加诺兄反映，但此事就此被搁置了，加诺兄没有答复何时运送，中国方面也就没有把武器运来。

大约一直到 1965 年初，加诺兄有意组建第五军种，目的是为了接纳来自中国的援助武器。当时认为四个军种（陆，海，空军和军警）的装备都已齐全了，因此，为了使受援武器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加诺兄有意组建第五军种。假如运来的武器能装备四十个营，那么第五军种也就是这个规模，因为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提供无偿援助的武器。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加诺兄并未详细说明第五军种是什么形式，他只说，“第五军种不同于现有的军种，它是独立的特种部队，和其他军种没有关系”。我必须强调这个事，因为后来的传闻说第五军种就是工人和农民的武器部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确实曾那样提过，但加诺兄未曾详述第五军种是何种形式的部队。

加诺兄下台后，这个传闻就被当成了历史资料，甚至编入了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供学生学习，加诺兄当然再也无法驳斥这传闻，因为从此后加诺兄成为苏哈托的俘虏直至逝世。

加诺兄成了被击败的一方，而社会上再无法以清醒的头脑看待总统。如果社会上有头脑清醒的人就必定会分析，只有愚蠢的领导人才会在相对刚刚诞生的国家里武装工人和农民，因为这样做将使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都知道加诺兄并不傻，或许，当时社会上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但他们不敢于揭发。在新秩序时期，谁谈论政治，尤其是抨击新时期的历史，谁就再也回不到家中，不是吗？

虽然加诺兄提出组建第五军种思想时并没谈及“武装工人和农民”细枝末节之事，但军界就已经表示不同意。陆军司令亚尼中将直接向总统表示他不同意组建第五军种，其他将领支持亚尼的表态，他们都不同意组建其他军种，他们认为四个军种已经足够。

亚尼向总统表明他的态度之后，这个问题变成政治界精英谈论的议题。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和推测变得没完没了，对组建第五军种的形式出现了许多猜测，亚尼反对加诺兄提出的这个想法也产生了多种猜疑。以此同时，加诺兄对组建第五军种的形式仍不做任何详述。当时我作为加诺兄最亲近的人，他当时都没有告诉我。

直到后来加诺兄召见亚尼，指定他于 1965 年 10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上午八时到总统府见总统，其议程是，总统想再问亚尼对第五军种问题的看法。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诉我，当亚尼接到总统的召见书时，即 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前几天他曾经说：“也许我的陆军司令职位将被撤换，因为我不同意组建第五军种。”亚尼的话很快就传开了，甚至在陆军高级将领中流传，称代替亚尼职位的将是陆军第二号人物即卡托·苏普罗多。

但是，亚尼在见苏加诺总统之前几小时被谋杀，据推算，大约是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凌晨四点，也就是他要去见总统的四小时前。

四 第二章：受操纵的运动

加诺兄感冒了

有件小事但被苏哈托影子集团夸大了的，甚至后来成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件事就是关于加诺兄于 1965 年 8 月初生病一事。

在许多历史书中叙述加诺兄当时病得非常严重，甚至传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艾迪从中国请来了医生。给加诺兄看病的中国医生表示，加诺兄正处于危急状态。传闻核心即加诺兄不病死也肯定瘫痪，这是形容当时加诺兄确实病重。从传闻分析出当时与加诺兄关系密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担心国家领导权将旁落陆军手中。鉴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 1948 年茉莉芬（Madiun）事件以来，和陆军的关系就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根据上述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旦知道加诺兄病重，为了夺取政权，他们组织力量，最后发动 9.30 事件。

这是苏哈托编造的谎言，作为他指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 9.30 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依据。这些也都记录在许多书中，因为实际上也只有这种信息才允许存在，但无穷落实。因为作为当事者——加诺兄，艾迪以及中国医生，三者都无法提供证词对证。加诺兄被拘禁至直逝世，艾迪未经法律程序就被枪杀，而中国医生生死未卜。这就是被扭曲了的历史。

但是，除了以上三人外，还有别的证人，那就是我本人和第二副总理雷门纳博士（Dr. Laimena）。别忘了，我是个医生，同时和加诺兄关系密切，我确实了解这“小事件”。

事实是如下：加诺兄确实经由艾迪介绍来的华人医生作过体检，但这医生不是从中国请来的，而是从雅加达 Kebayoran Baru 由艾迪引荐来的。在华人医生为加诺兄检查身体前后，我为加诺兄检查过。当我为加诺兄作体检时，雷门纳医生也在场，因此共有三位医生为加诺兄检查身体。

当时加诺兄患的是感冒，很清楚，华人医生当着我和雷门纳博士面对加诺兄说他只是患了感冒，艾迪也知道加诺兄的病，患病原因我知道。他发病的前几天晚上曾出门走走，去视察雅加达的几个市场，目的是亲自查看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他晚间出入市场没有警卫人员随从，加诺兄经常这样做。这就是加诺兄受凉生病的原因。

但是，说成加诺兄病重加以流传，由此得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力量夺取国家政权的结论，最后所以爆发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策划的 9.30 事件。

这个消息全然不准确，艾迪是了解真实情况的。这意味着苏哈托集团有意捏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的所谓符合逻辑的传闻。或者通过捏造上述故事给人们留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理由发动政变的印象。

当卡马鲁查曼（Kamaruzaman 又名 Sjam）被审判时，他强化了苏哈托集团编的神话故事。Sjam 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特别局局长，同时又是陆军情报部门的军官，Sjam 供认当加诺兄生病时，1965 年 8 月 12 日艾迪曾叫他到家里来，并告诉他有关 " 总统病重 " 的消息，假如加诺兄病逝，将领委员会有可能会立即采取行动。Sjam 还说，艾迪命令他 " 观察我们的力量 "，并准备某种行动"。Sjam 的这些招供，后来成了撰写许多书籍的资料。

没有左证就无从对证。原来可以提供左证的人有五位，即加诺兄，艾迪，华人医生（我忘了他的名字），雷门纳和我本人。但是，9.30 事件发生后，这些人都处于弱势地位。审讯我的时候，没有指控我与 9.30 事件有关，因此我不便于揭发。

现在我说出来，所有记载有关加诺兄生病的事都是不正确的。艾迪知道加诺兄只是受凉而已，如果他命令其手下 Sjam 准备某种行动，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加诺兄病情并不严重情况下，就赶在陆军尚未行动之前抢夺政权，这是他们的逻辑。符合逻辑的分析应该是：艾迪内心会很平静，因为加诺兄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何必在加诺兄还很健康而且又很得宠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呢？

关键的问题是：1965 年 8 月，苏哈托影子集团明显地想加快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步伐，其做法就是如上所述，进行各种挑衅。挑衅行为是指陆军右翼将领们为促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首先攻击陆军这样一个斗争策略，这是他们为获取人民承认其行为合法性的一个谋略。假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攻击陆军，那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落入致命困境的圈套。因为陆军似乎处于被迫反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攻击，此时陆军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击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苏哈托阵营里采取的策略，利用陆军收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但是，别忘了，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没有狡猾的计谋是不可能轻易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然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没有因此上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虽然受到如此挑衅，但他们没有扣动扳机，也许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察觉到陆军设的陷阱。此时艾迪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并没有向某成员下达指令。虽然从未有确切的证据揭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直接参与 9.30 事件，然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最终还是被指控为 9.30 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9.30 事件是军队所为，并得到同样是军人苏哈托的支持。艾迪未经法庭审判就被处决了。

" 将领委员会 "

" 将领委员会 " 的传闻实际上源于第五军种。如前面所述，第五军种又源于中国提供无偿武器装备的计划，这三件事有密切关系。前面部分我曾披露过中国提出无偿援助武装四十个营的武器装备的建议，苏加诺接受了，但只有停留在口头上接受建议而已，其实武器并未运来。加诺兄有组建第五军种的想法，但他尚未详细考虑第五军种的形式。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陆军司令亚尼不同意组建第五军种，其它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军官们也跟随亚尼，表示不同意加诺兄的想法，都认为现有四个军种已经足够。正因为如此，传出有一群陆军军官不满总统的传闻，这传闻传开后，人们就称呼那些不满总统的一群将领为“将领委员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又传出将领委员会要发动政变的消息。

临近 9.30 事件发生之际，总统召亚尼到总统府见面，看来亚尼感觉到总统会生他的气，因为他不同意组建第五军种，亚尼甚至做好将他的职位让给别人的准备。同时也盛传亚尼的陆军司令职位将由他的副手卡托·苏普罗多少将替代。苏加诺总统下令亚尼于 1965 年 10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上午八点到总统府见他，然而见总统之前的几小时亚尼遭绑架并被谋杀。

最认真对待将领委员会传闻的是翁东·山苏里（Untung Samsuri）中校。作为总统警卫团指挥官之一，他对危害总统安全的一切可能性必须明察秋毫。翁东感到忧虑，因此他计划在将领委员会采取行动之前逮捕他们。翁东把他的这一计划告诉了苏哈托，对此苏哈托表示支持，而且许诺给翁东提供部队支持。这些事是当我们一起被关押在万隆芝玛墟监狱时，翁东告诉我的。（详见“编组久友情”一节）

最初我是从我在中央情报部的副手那里得到有关将领委员会传闻的报告，但不很详细，只是说有一群陆军将领组成的将领委员会将对总统发动政变。接到此信息后，我直接向总统报告，然而我尽力进一步深入了解此事。亚尼轻松的回答确有此事，但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筹划武装部队晋级的事，而不事是一个发动政变的委员会。

我还不满足于此，因此又问了苏巴尔约准将（Soeparjo 第二战斗司令部司令）。从苏巴尔约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苏巴尔约说：“的确是事实，如今将领委员会已准备建新内阁。”

1965 年 9 月 26 日，传出了更详细的信息。这信息来自四位文职人员，他们是慕之里斯·伯拉答纳，纳瓦威·纳苏帝安，苏曼特里及奥古斯·赫尔曼·斯马杜邦。前两者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成员，后两者是拥护印度尼西亚独立同盟党的成员。他们说：1965

年 9 月 21 日在雅加达军事法学院大楼曾召开将领委员会会议，其中会议通过了将领委员会组建的内阁成员名单。

慕之里斯不仅口头讲述，而且还拿出会上讨论的录音磁带。该录音磁带录有巴尔曼中将（S. Parman 系 9.30 事件的牺牲者之一）宣读内阁组成人员的讲话录音。

根据该录音带内容，将领委员会组成的内阁阵容如下：纳苏帝安中将（AH Nasution）任总理，亚尼（A Yani）中将任第一副总理（意味着替代我）兼防务与安全部长，巴尔曼（S. Parman）本人任司法部长，易普努·苏托沃（Ibnu Sutowo 后来苏哈托任命他为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总经理）任矿业部长。

后来我把这盘录音带交给加诺兄。显然将领委员会的这一策划是敏感问题，并对苏加诺政权的延续是个严重的威胁。按理这种计划是属于绝密级，但为何会通过四位文职人员泄露出来？因此我得出结论：不外乎只是作为挑衅手段，那么这录音带是假的，其

目的是为了在吐露风声中使他们的重大图谋日臻完善，这样就可以影响翁东，使他确信原来仅仅属传闻的将领委员会确实存在。

与将领委员会几乎同时出现的传闻是 Gilchrist 文件。这个文件本来是雅加达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电报（属于绝密级文件），是 Sir Andrew Gilchrist 发给英国外交部的。由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婆罗洲（有一部分属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问题出现对抗局面，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状态，上述绝密文件泄密了。当时原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刚刚独立，英国派兵到婆罗洲支持马来西亚。

我是第一个看到 Gilchrist 文件的人。我得到此文件时是随便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文件已经开封，也许是我的职员启封的。根据我的职员说，该文件是由一个自称 Kahar Muzakar 的通讯员送来的，没有别的身份证明，也没有地址。但根据我得到的信息，该文件原来存放在一个名为 Bill Palmer 的美国人家里。此人住在雅加达，是美国电影发行者，他的住宅常常成为各界青年游行的目标。一些青年人反对放映黄色电影，他们猜疑那些影片是由 Palmer 发行的。

根据我的分析，文件内容非常严峻，主要内容是：Andrew Gilchrist 向他的上司——英国外交部汇报他倾向于支持美国推翻苏加诺总统政权。文件中还有 Gilchrist 和他的通行美国人有关准备在印度尼西亚发动军事行动的谈话。我摘录其中的一段话：“这个计划和我们的地方军人朋友们一起执行就够了。”

确实非常严峻。此之前流传着一本有关英美谋划进攻印度尼西亚的书籍。其实英国政府明知该绝密文件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传开了，但他们未曾提出驳斥。我作为中央情报部部长竭力发动情报员去落实文件的真实性，结果令我确信 Gilchrist 文件是真实的。

最后我将该文件完整地汇报给苏加诺总统，他的反应是感到非常吃惊。他一而再问我对该文件的真实性如何看待，我也一而再地再表示文件肯定真实，他就召集将领们讨论分析此事。从加诺兄的反应，我得出结论：Gilchrist 文件不仅使他忧虑而且恼火。加诺兄作为行动的目标，他被激怒了，然而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完全没有表露出忧虑的迹象。根据我观察，加诺兄肯定感到不安。所以我的结论是加诺兄因受到挑衅而感到恼火。

撇开该文件的真伪，我分析这是一种挑衅手段，让印度尼西亚陆军在原本就不稳定的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可以从两件事说明它是挑衅：第一，文件内容足以让受害者恐惧；第二，有意泄露文件内容，让它落到加诺兄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者手中。该绝密文件怎么可能存放在成为青年人示威游行目标的 Palmer 家里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挑衅手段吗？

我认为，假如 Gilchrist 文件作为挑衅手段，那么这是第一个挑衅。而第二个挑衅手段就是抛出将领委员会传闻。如果按公开活动的常规来衡量，那么两种挑衅手段的主要起因确实相当难以确定。

另一方面，苏哈托在将领委员会的传闻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9.30 事件发生前夕，苏哈托派约卡去见巴尔曼少将，目的是转达苏哈托的建议，叫巴尔曼要小心，因为要绑架将领委员会的风声很紧。然而谁也不知道风声从哪儿传出。

巴尔曼并不认真对待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传闻。巴尔曼问约卡：“约卡兄是否有证据？”他回答“没有”。接着巴尔曼建议约卡要找出证据，并说：“尚无证据之前，别只相信传闻”。约卡答应寻找证据。

9.30 事件发生后，我想起约卡对巴尔曼提出的建议。约卡是苏哈托三人小组的成员，因此我得出结论，约卡向巴尔曼传达信息的目的，是想了解巴尔曼的反应。众所周知，巴尔曼和亚尼的关系很密切，约卡想试探巴尔曼是否得知该信息，同时，可能的话，还可以揭示巴尔曼对该传闻的预知程度。由于巴尔曼是亚尼的亲密朋友，从巴尔曼的反应也可窥探到亚尼所做的准备。

从巴尔曼上述反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将领委员会确实存在，巴尔曼也预料不到其发展方向。巴尔曼没有准备面对即将发生任何可能，这也表明亚尼也没有准备。假如把我询问亚尼有关将领委员会的传闻联系起来，那么非常清楚，亚尼是毫无准备的。

关键是约卡和巴尔曼反馈回来的信息中，苏哈托集团获得了亚尼集团对绑架事件的可能性全无预料这样一个信息：还有，苏哈托计划利用拉迪夫上校和控制翁东一伙的活动也尚未被敌对方（即亚尼集团）所察觉。

假如行动失败，或未达到预期目的（尤其暗杀巴尔曼失败），那么约卡的警告将另有含义，这个“警告”将成为苏哈托“救”巴尔曼的功劳。苏哈托仍可以英雄姿态出现。苏哈托采取的行动确实有计谋。

美国扮演的角色

总统患病及将领委员会之传闻是否是美国导演的？美国因为害怕印度尼西亚被共产党所控制，又由于苏加诺总统倾向左派，因此他们部署了两个计划：粉碎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

美国除了不喜欢加诺兄之外，还在于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及亚洲的经济利益。例如：马来西亚有丰富的橡胶和锡矿；文来苏丹国富于石油；而印度尼西亚则拥有各种矿产和农产品，印度尼西亚幅员又远比马来西亚和文来辽阔。更具体的说，美国必须保证它在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企业（Caltex 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企业的安全。

因此，美国认为加诺兄的政策危害了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但是他们又很难改变加诺兄的确强硬态度。美国曾试图劝说加诺兄改变其政治态度，但失败。在政治上，加诺兄是很强大的，在国内，他得到武装部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人民的赞赏和同情；在国外，加诺兄的不结盟政策得到东南亚各国的支持。

综上所述，我直觉的深信美国参与了上述两件传闻。关于总统患病的事，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设陷阱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行动陷入致命困境，因为艾迪确实知道总统只是患了感冒而已，他们导演“传闻”一事更重要的目的是转播给广大群众。假如有一天

发生夺权行动，就会很自然地视它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为。如果总统病重，理所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夺权，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害怕军队掌握政权。也正因为如此，军队要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

将领委员会更多的是由国内人扮演，虽然美国借着中国提供武器，第五军种以及亚尼反对成立第五军种等等传闻来帮助他们，但是从 Gilchrist 文件可以很清楚看出美国其中的作用。当初该文件是存放在美国公民 Bill Palmer 家里，据我所知该文件是真实的，但为何要泄露出来呢？

上述一切是我的直觉。事实上，1965 年 9 月中旬，美国运送大批药品援助印度尼西亚，该援助令我吃惊，印度尼西亚不是在遭受地震灾害，也没有什么灾难或战争，有的话就是 1965 年 10 月 1 日发生的屠杀事件，杀害六名将领和一名尉官。此后一周，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及青年们的协助下，陆军屠杀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那些药品运来时，大约有四万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及其同情者被屠杀。因此，此时运送药品是反常的。如果说美国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供药品援助，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此后不久，我接到报告，寄药品只是为了掩饰，只是一种伪装以掩盖远比此更为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是运送武器援助军队和青年去屠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很遗憾，我对这件事的了解太晚了，当时加诺兄已临近结束他的政治生命。但至少，使我更加深信，美国参与了有关 9.30 事件的一连串事情。

对美国而言，为保证他在东南亚的统治地位，因此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经验老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各国大搞颠覆活动以击败他的对手，常常名噪一时，然而这种名声却偏偏在美国国内受到本国人民毫不留情的谴责。

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心腹之一，他在搞颠覆活动方面的名声，毋庸置疑。他来印度尼西亚任职之前是美国驻韩国（南朝鲜）代办，并完成了美国赋予的使命，帮助朴正熙（Park Chung Hee）将军领导的军事叛乱，后来朴正熙领导了韩国军政府长达三十年。临近 9.30 事件发生之际，马歇尔·格林替代了约翰逊（Howard P. Jones）。因此，格林和约翰逊是 1965 年 10 月 1 日悲剧的外国重要角色。

显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不可能单靠自身力量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尤其美国于 1965 年 2 月开始第一次轰炸北越后，他们确实集中精力专门消灭各个共产党。无论在印度尼西亚或北越，他们确实都需要有当他的合作伙伴。

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招募卡玛鲁查曼即著称的 Sjam 作为间谍。Sjam 是为军人，同时又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Sjam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地位非常重要，即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特别局局长，也可以直接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反对将领委员会的军官们给我提供信息，Sjam 经常主持陆军内部会议。Sjam 到底是混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队伍的军人，还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潜入陆军内部的人，我不是很清楚。但很明显，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国内的合作伙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当地有个以双重身份潜入两个敌对阵营的密友而获益。

然而，Sjam 的“表演”太粗劣。记住他的表白，即他承认艾地于 1965 年 8 月 12 日叫他来讨论关于总统病重一事，并说：“假如总统病故，将领委员会可能将立即采取行动”，这是他在艾地被杀害以后说的话。

Sjam 在法庭上说，枪杀诸将领的命令是他下达的，但他都是接受艾地的指令，这就是除了 1965 年 9 月 30 日晚艾地身处哈林现场之外，加重艾地罪状的唯一证词。然而艾地没有机会说话，因此他于 9.30 事件发生后几天，在中爪哇 Bojolali 被雅西尔·哈迪普罗多（Yasir Hadibroto）上校的部下枪决了。

假如 Sjam 是位军人，这意味着他是个铁锤，他的证词非常有利于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一方。然而他被拘留多年后，终被法庭审判并处决。他多面地倾向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陆军及美国，但终究对他自己没带来什么好处。

编织旧友情

这是揭露苏哈托与 9.30 事件有牵连的一个组成部分。9.30 事件发生前一些时候，苏哈托与两位老朋友，即印度尼西亚陆军中校翁东和印度尼西亚陆军上校拉迪夫只是被指控与该事件有牵连。

翁东是苏哈托当年在中爪哇任蒂博尼哥罗师司令时的部下。翁东个子较矮小，但他是个具有勇敢精神的人。在万隆芝玛墟监狱和我相处的几个月中，我确切知道他并不喜欢政治。他是那种忠于上级的典型军人，就像真诚的战士普遍具有的精神那样。他的个性单纯而憨厚，这可以从他直到被处决前些时候的事实为证，他仍然坚信对他本人的死刑判决不可能执行。有一天他对我说：“相信吧，班兄，他们对我的判决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支持他采取行动杀害诸将领的苏哈托。这问题将在下一部分阐述。

大约在 1950 年末，苏哈托和翁东分开了，不在同一个部队，但 1962 年他们又在一起了。他们是为了从荷兰手中夺回西伊里安的任务又结合在一起。当时苏哈托任曼达拉（Mandala）司令部司令，而翁东是正在前线执行任务的苏哈托的部下。在执行任务中翁东表现得特别勇敢，他带领了一个小分队战斗在 Kaimana 大森林中，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最后取得胜利，1962 年 10 月 15 日荷兰政府把西伊里安交给联合国，后来联合国于 1963 年 5 月 1 日将西伊里安归还印度尼西亚，西伊里安重新回到印度尼西亚的怀抱。苏加诺总统听到了翁东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因此授予他勋章。

此后翁东和苏哈托又分开，不在同一个指挥系统。苏加诺总统任命翁东为总统警卫营指挥官，而苏哈托任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然而，任命翁东到新的岗位却引起苏哈托懊恼，因为苏哈托知道翁东是个勇敢的人，本想把他调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成为他的部下，但无奈，总统已经着手把翁东调到精锐的总统卫队，苏哈托只能失望。

当时以加诺兄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一方与以陆军将领们为另一方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尖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这个矛盾随着政治势力和军队势力两极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矛盾随时会朝着一个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因为加诺兄是一位得到人民以及除了一小部分陆军军官以外的大部分武装部队军官们支持的具有超群魅力的领袖。另一方面，正如我前面所述，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当时拥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可以想象，假如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话将会发生怎么样的后果。

正当矛盾越来越升级时，苏哈托却恰恰对翁东当上总统警卫营指挥官感到很侥幸。在等待夺取国家权利的苏哈托一方看来，翁东的职位非常关键，因此，苏哈托和翁东的关系重又修好。虽然此前一段时间苏哈托曾对翁东发火并憎恨他，但以下表现足以证明他们的关系又和好起来了。即此后不久的1964年末，翁东在Kebumen举行婚礼，苏哈托及其夫人亲临Kebumen出席了翁东的婚礼。

本来嘛，一个司令员参加原部下的婚礼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从雅加达到Kebumen的距离不算近，更何况当时的交通工具，尤其路况相当差，如果不是非常重要，苏哈托不可能偕同夫人出席翁东的婚礼。苏哈托接近翁东的举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精英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对苏哈托如此关怀翁东觉得奇怪。

另一方面，苏哈托也和拉迪夫上校培育旧友情，拉迪夫也同样是在蒂博尼哥罗师时从属苏哈托部下。拉迪夫同样也是一位勇敢的军人，我评价他也是个诚实的人，但拉迪夫与翁东不同，他掌握着苏哈托于1949年3月1日全面进攻日惹战斗中军队丑闻的秘密。在那次进攻中仅用了六小时就把荷兰人赶出日惹市（当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因此这次战斗也被称为“日惹六小时”，在历史上称为“嫩椰子叶军事行动”，因为在采取行动过程中，所有部队约二千人（包括青年游击队员）左前胸必须别上嫩椰子叶（把椰子叶撕成一小片）为标志。有谁没戴上这特别标志就有可能被视为荷兰人的间谍，若被打死一概不负责。

苏哈托（后来）声称成功赶走荷兰人是由于他自己很勇敢，他说1949年3月1日的全面进攻是他的主意。有关此事在许多书籍中都有阐述，那次进攻实际上是苏丹九世（Hamengkubowono）陛下的想法，苏哈托只是进攻的行动指挥官。但是对拉迪夫来说，这问题很深奥，他仅仅是个营级指挥官之一，出于在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部时他认识了苏哈托，所以他与苏哈托的关系比较亲近。拉迪夫没有谈及进攻行动是谁的主意，他只是谈到战斗的技术性问题。

我们的部队从四面八方攻城，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早晨六时开始进攻，正好警报声响起，意味着宵禁结束。荷兰人突然遭到大兵力的进攻而感到很吃惊，他们的反抗对我们部队而言算不了什么。荷兰人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部队袭击，他们在战略上失败了，他们的许多军营被我们的军队夺回，但荷兰人有机会从其他城市求援。虽然他们的援兵来得较晚，但他们拥有的武器比我们好，他们还调遣装甲车，此时整个日惹市陷入剧烈的交战。

在小范围内，拉迪夫领导的部队遭到荷兰军队的反击，被打得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拉迪夫下令其部队撤到Kuncen基地，一边向敌人进行反击。等回到后方，拉迪夫检察官检查剩下的部队只有十个战士，在撤退中粗略知道十二人受伤，两人牺牲，受伤的不得留在战场上，有很大可能也都牺牲了，而青年游击队员们（也在拉迪夫领导下）牺牲了五十人。

正当拉迪夫和剩下的部队到达后方时，他们见到了苏哈托。苏哈托在干什么呢？拉迪夫说：“他正休闲地吃牛肚汤”。当时战斗正在剧烈地进行中，成千的军队和青年游

击队员们正奋不顾身地为夺回被侵略者占领的土地而浴血奋战，拉迪夫以坚强战士的姿态向苏哈托汇报其部队的情况，苏哈托连应酬话都不说，例如问问拉迪夫及其部下要不要吃饭等，相反苏哈托却直接命令拉迪夫和剩下的部队向离他们不远的 Kuncen 基地周围的荷兰人发动攻击。

荷兰人最后在六小时内被赶出日惹城。虽然在小范围内拉迪夫领导的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但从全局看，这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取得了胜利。整个部队的指挥官是苏哈托，当然他可以拍拍胸膛夸耀他的英勇，甚至后来苏哈托更“勇敢”地声称这次进攻是他出的主意（如今已证实不是那么回事）。然而在拉迪夫眼里，作为一名战斗指挥官，从形象而言，关于“牛肚汤”一事成了独特丑闻。后来，当拉迪夫在军事法庭上被指控与 9.30 事件有牵连而受审时，他揭露了上述丑闻。尽管如此，这件丑闻并未扩散，因为当时苏哈托已经掌握了政权，苏哈托已成为赢家，而拉迪夫是失败者，所有来自失败者的信息都将被获胜者所否定。

3 月 1 日全面进攻后，苏哈托和拉迪夫分开，不在同一个部队，苏哈托后来当上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而拉迪夫当上了大雅加达市军区司令部 Jaya Sakti 第一步兵旅司令员。拉迪夫的地位相当重要，因此，苏哈托又重新培养起与拉迪夫的老关系。如果说翁东举行婚礼时，苏哈托夫妇亲临 Kebumen 出席婚礼，那么拉迪夫为其儿子行婚礼时，苏哈托夫妇也亲临拉迪夫府上。我想，苏哈托接近拉迪夫是他“未雨绸缪”的计谋，因为有朝一日苏哈托需要利用拉迪夫。

如今往事重演，如果说以前苏哈托与约卡及阿利·慕托伯组成三人小组，现在苏哈托与翁东及拉迪夫一起又组成三人小组，他们全都是在中爪哇时的老朋友，但这次的三人小组（与翁东及拉迪夫一起）跟前期的三人小组相比，他们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翁东是总统亲近的人，拉迪夫是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他保卫着雅加达的安全。苏哈托的目标很明确：眼盯着总统府。

当时很少人能看透该三人小组的阴谋，因为这三个人小组除了没有采取激烈行动外，他们在军队排行中地位并不高。然而我作为总统最亲近的人，我有一种感觉，他们的友情将会动摇总统府。至少，他们会加强纳苏帝安所开创的事业：即实现“国中之国”，因为加诺兄与陆军的矛盾日益尖锐。

除了组成三人小组外，苏哈托也接近苏巴尔佐 (Soepardjo) 准将 (原来在 Siliwangi 师，后来苏哈托调他任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第二战斗司令部司令)。

1965 年 9 月中旬雅加达的政治气氛开始紧张，鉴于友好关系，拉迪夫私下会见了苏哈托。这是苏哈托和拉迪夫在 9.30 事件发生之前的第一次重要会晤。当时将领委员会的传闻已经传开，苏哈托表示他已经知道，他说：“前几天来自日惹名叫苏巴约 (Soebagyo) 的一位陆军朋友告诉我此事”。苏巴约是谁，我不清楚，但根据拉迪夫说，苏巴约是他们还在蒂博尼哥罗师时在一起的一位军人朋友。

几乎同一时间，1965 年 9 月 15 日翁东也见了苏哈托。翁东也汇报了有关将领委员会将发动政变一事，与拉迪夫不同的是，翁东表示他计划赶在将领委员会发动政变之前先把他们抓起来。翁东确实是一位加诺兄的忠诚助手，他作为总统卫队指挥官之一，他的态度是正确的。

苏哈托如何回答他呢？苏哈托说：“你有这个计划很好，消灭他们，不要犹疑不决”。苏哈托甚至表示愿意向翁东提供部队支持，苏哈托说：“假如需要部队的援助，我可以帮忙”。翁东得到支持感到很高兴，他接受了这个援助。苏哈托并没有开玩笑，他说：“可以，我将尽快从东爪哇和中爪哇调部队来”。

记住，苏哈托与拉迪夫见面以及苏哈托和翁东见面是毫无关系。见面时间，谁在前谁在后，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1965年9月中旬发生的事。起初，在将领委员会的问题上，苏哈托和翁东的关系与苏哈托和拉迪夫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关联，不过他们都是来自蒂博尼哥罗军区司令部。翁东和拉迪夫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队，但关系不错，最后他们都知道苏哈托对逮捕将领委员会是支持的。

苏哈托的援助承诺确实兑现了。在苏哈托的命令下，1965年10月1日之前几天，从三宝壟，泗水和万隆调来了几个营的部队。苏哈托命令的内容如下：部队必须配备一级戒备的战斗装备到达雅加达，然后从1965年9月26日起，部队分期抵达雅加达。很明白，调部队来是为了歼灭将领委员会。为歼灭将领委员会而组成的部队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地区和苏哈托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的部队。

9.30事件爆发后，苏哈托调转枪口对付事件中的执行者，然后苏哈托指控事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幕后操纵的。苏哈托制造了各色各样的谎言。从万隆，三宝壟和泗水调遣部队，他借口是为了准备10月5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庆典仪式，这从逻辑学角度分析是不合情理的，支持部队是1965年9月26日以一级戒备的战斗装备抵达雅加达，这很清楚，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纪念日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逻辑的。最主要的是，从我得到的情报，以及当我们一起被关进监狱时，翁东对我说的话都证实了苏哈托派出援兵是为了支持翁东消灭将领委员会，这是经翁东和苏哈托讨论过的。

苏哈托和拉迪夫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65年10月1日的前两天，会面是在苏哈托H.阿古斯·沙林街（Jalan H. Agus Salim）的家里。根据在监狱里拉迪夫对我说的，他当时向苏哈托汇报将领委员会将对总统发动政变，而将领委员会又将被总统卫队绑架。苏哈托反应如何呢？拉迪夫说：“他没有反应。当时苏哈托家里有别的客人，因此我们转移话题，谈家常”。

苏哈托与拉迪夫的最后一次见面正好是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间十一点，地点在Gatot Subroto陆军中央医院。当时苏哈托正在医院看护他的儿子托米（Tommy Suharto），他儿子因被菜汤烫伤住院治疗。这次拉迪夫向苏哈托汇报了绑架诸将领行动将于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凌晨四点（大约四小时以后）执行。这次苏哈托也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当时要向苏哈托汇报的有三个人，即拉迪夫，苏巴约准将和翁东中校。在会见苏哈托之前，拉迪夫早已同苏巴约及翁东见了面。拉迪夫说：“当晚（1965年9月30日）约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九点，苏巴约和翁东来到我家，因苏巴约正好有事，而翁东不大敢对苏哈托讲，所以苏巴约就对我说：“算了吧，迪夫（对拉迪夫的称呼）还是你去见苏哈托，你告诉他，我们正好有事。”拉迪夫学着苏巴约的腔调说。

拉迪夫见了苏哈托后，回头立即去见正在某地等待他的苏巴约和翁东，拉迪夫满面笑容的地向他们汇报说苏哈托在背后支他们。

我重复一遍：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凌晨一点，拉迪夫对苏巴约和翁东说，苏哈托在背后支他们。几个小时后，部队采取行动捉拿诸将领。

苏哈托供认的关于1965年9月30日晚在陆军中央医院与拉迪夫最后会面一事，值得大家注意，他在两个不同场合讲述过。

首先是1968年对美国记者坡拉之曼（Brachman）说的，当时坡拉之曼问苏哈托，为什么没有把他列入被绑架的将领名单里。他回答坡拉之曼时说：“确实如此，1965年9月30日之前两天，我三岁的儿子胡多默·曼答拉·布特拉别名托米·苏哈托被菜汤烫伤，立即被送往陆军中央医院。来访者中的拉迪夫问起我儿子的情况，我当时对他关心我儿子而感动。但是，实际上在发生的政变中，拉迪夫是个重要人物。因此，很明显，拉迪夫来到陆军中央医院的不是来看我儿子，而是来核实我究竟在何处。是为了证实我是否在陆军中央医院。事实证明我确实在陆军中央医院，直到午夜后才回到家里。”

1970年6月德国记者德尔·斯比克（Der Spiegel）采访苏哈托时也提出了与坡拉之曼所提的相同问题：为什么苏哈托没有被列入被绑架的陆军军官的名单里。苏哈托回答德尔·斯比克说：“拉迪夫及其同伙于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23点来到陆军中央医院，目的就是来谋杀我。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公共场所谋杀我，他有顾忌”。

事件终于爆发了

9.30事件爆发时，我不在雅加达。我正在各地执行视察任务，叫做“下基层”。1965年9月28日我起程前往苏北棉兰市，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巡回视察了东爪哇和印度尼西亚东部，我的使命是让两项人民命令内阁的各项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赴棉兰时，我的代表团与空军少将斯里·穆尔约诺·赫尔兰邦的代表团去了明古鲁（Bengkulu）和巴东（Padang），我的代表团则前往棉兰市。

10月2日苏加诺总统直接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天前发生的事情，并于同一天命令我立即回雅加达，总统叮嘱我要小心。总统叮嘱我：“警惕，班，要小心，你乘的飞机会被击落”，但我还是乘飞机返回雅加达。我当然得警惕，因为提醒我的不是一般的人。一到雅加达，我直奔茂物总统府去见苏加诺总统。过了些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加诺兄提醒我要小心的原由。因为当穆尔约诺返回雅加达时，他的机座在Tibet地区遭到炮击，以至他乘的飞机要在空中盘旋寻找着陆点，最后飞机在茂物附近紧急着陆。

我抵达茂物时，形势比我启程前往棉兰之前有很大的变化，加诺兄面部表情显得紧张，雷门纳和查鲁尔·沙雷正在商讨种种问题。我得到信息，当时加诺兄已经被苏哈托所控制，不许他离开茂物总统府。

一天之前，雅加达发生了严重事件，七位陆军军官被绑架，之后于凌晨被谋杀。

我是从我的同事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得到此信息的。过后几天，我向我的同事及我的部下继续收集消息，我收到了围绕1965年9月30日事件以至诸将领被谋杀的一系列消息，有一部分我记录下来，有的部分没记。

我几乎全部都还记得住，我所收到的全部信息，包括之前我已知的各种迹象，可以在此披露。然而如果不与新秩序的历史数据相比较的话，会觉得我的阐述不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由于这缘故，有的部分我摘录苏哈托讲述的数据以作对比。

1965年9月29日早晨，吴玛尔·丹尼（Oemar Dhani）空军司令向苏加诺总统汇报有关许多地方部队进入雅加达一事。此前，我曾向加诺兄汇报有关自称将领委员会的一伙陆军军官对总统的不满，包括泄露出来的将领委员会组阁计划的情况，同时也汇报了有关Gilchirst文件的事，所有的汇报材料在加诺兄的脑海里交织着，把各种汇报的材料集聚在一起看，都显示着将有一个大事件发生，我相信，加诺兄其时还在疑惑不解，不知将发生什么事。

根据苏哈托所供认，1965年10月1日接近凌晨时分，他离开了在陆军中央医院的儿子回到在阿古斯·沙林街的家中。据他说，他离开陆军中央医院时只身一人（没有警卫），开着丰田吉普车。他的车从陆军中央医院路经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然后驶进东独立街。他承认在那里能感觉到形势不寻常。在东独立街周围集结了许多部队，但他一直将车往前驶去，没有理会集结在民族纪念碑的十几个军队。

后来苏哈托供认，回到家后就睡了（苏哈托在几个公开场合是这么说的）。苏哈托的供词称第二天早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五点三十分他被一位邻居叫醒，并告诉他关于刚刚发生的绑架将领们的事。“然后我就直接奔向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苏哈托说。

苏哈托的供词出奇的离奇。首先正当雅加达处于非常紧急状态，他独自开车，没有警卫。不要说处于那种形势下，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他始终都有警卫保护。

第二，他经过东独立街时，他承认看到几十个战士集聚在一起，他感觉到某种不寻常，但他不予理睬。他作为一位部队司令，难道他不想知道如此深夜几十个战士集聚在一起到底想干什么吗？

第三，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早晨五点三十分，有谁会知道刚发生绑架将领们的事件？当时还没有电视新闻，不像现在（如SCTV电视台早晨六点就播新闻）能尽快地报道几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也到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七点才报道这一事件。

实际上，苏哈托已知道集结在民族纪念碑的部队是要捉拿将领委员会的成员，该部队的大部分成员（约三分之二）就是他自己从泗水，三宝壟和万隆调来的。还记得苏哈托曾提出提供援兵的建议，翁东乐意地接受了。

来自地方的配备一级戒备战斗装备的这些部队，已经同翁东的总统警卫部队结合在一起，他们集结在民族纪念碑附近。除此之外，几小时前苏哈托从拉迪夫那里得到消息，部队已处于戒备状态准备捉拿诸将领，这样他当然可以深夜自个儿开吉普车，甚至也可以很镇定地途径几小时后将执行谋杀将领们的部队集合地点，虽然雅加达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因为对于苏哈托来说，没有什么可怕之处。

其实苏哈托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对公众说他看到了集结在民族纪念碑附近的一批部队，而他却不理睬他们。假如他将自已摆在对谋杀将领计划不知情的位置上，本来他在

自传中以及各种公开场合不该那样说，他声明他不理睬集结在民族纪念碑附近的部队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作为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怎能不理睬深夜里集结在民族纪念碑附近的一批部队呢？况且他还亲眼目睹。

事实是正如苏哈托在他的自传中所说，他深夜并没有回家。真实情况是他途径东独立街，看到处于戒备状态的一批部队之后，他便直接去了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在那里他向影子部队和支持捉拿将领行动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下达指示。

根据真实的时序，本来没必要有一段回到家睡觉的情节。

根据苏哈托供词，似乎想表明自己很诚实，他承认 1965 年 10 月 1 日凌晨确实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但他的顺序是从陆军中央医院出来，先回家睡个觉，后来被邻居叫醒并告诉他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早晨五点三十分发生绑架事件，而后他才去陆军战备司令部。

假如苏哈托在 9.30 事件中把自己置于没有过错的位置上，那么他的上述自供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住在 H. 阿古斯·沙林街的人（苏哈托的邻居）不可能了解绑架将领事件，并于印度尼西亚西部时

间早晨五点三十分叫醒了他。实际上绑架及谋杀诸将领是在此之前几分钟，即大约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凌晨四点发生的。

1965 年 10 月 1 日大清早发生的悲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疑点，即为什么没有把那些将领们送到苏加诺总统面前。按逻辑，假如真如传说所说，将领委员会的成员要发动政变，按理说捉拿他们后该送到苏加诺总统面前，要他们解释有关政变。如果将领们没有被杀害，而是被送到总统面前讲明真相，事情肯定将有不同的结局。

然而，借 9.30 事件，并把它作为一种力量去篡权，这其实远在事件发生之前早就已经定下调子。从苏哈托的观点来看，9.30 事件的发展不取决于它的力量强弱，而在于事件本身的利用价值。当将领们被谋杀后，利用价值也就完了，事件也就到此结束。虽然翁东，拉迪夫和苏巴尔约试图将 9.30 事件坚持延续下去，然而它的寿命仅仅几个小时便告终，此后事件中执行命令者便很快被追捕，被斩尽杀绝。苏哈托对 9.30 事件中的执行者进行清算，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他是很忠于上司（及被谋杀的亚尼及将领朋友们）的，于是他便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关于“为什么绑架将领委员会后，不把他们送往总统面前”的问题，有一位参与绑架的人的自供。带领战士们去接应哈尔约诺（MT Harjono）少将的苏玛尔·彭古思（Sumar Boengkoes 仪仗队警卫营三连排长）说，军队里没有绑架这个命令。只有“逮捕或粉碎”，“我从总统卫队团长达吴尔（Tawur）和翁东营长得到的命令是逮捕那些将领们”。这是彭古思从监狱获得自由后说的。

至于哈尔约诺不得已被枪杀是因为他的妻子阻止部队进屋。哈尔约诺的妻子对丈夫一大早被总统叫去表示怀疑，因此他的家门被撞开，而哈尔约诺被击中。哈尔约诺是当即牺牲还是所有将领集中到鳄鱼洞后被杀害的就知道了。

亚尼中将的情况是，当一群部队来到他家准备接他走时他很吃惊，不是因为接他的部队穿着迷彩制服，而是因为原定当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上午八时叫他到独立宫去见苏加诺总统。总统原本想询问亚尼有关第五军种的问题。之前，亚尼反对总统建

立第五军种，以至流传关于亚尼将被他的副手卡托·苏普罗托替代的传闻。

凌晨部队去接亚尼，他也许以为会见总统的时间提前了几小时，他从睡梦中被妻子叫醒，还穿着睡衣。虽然来接他的部队在他家中喧闹引起家人的惊吓，但亚尼还是顺从了。他对来接他的战士表示要更衣，但是那战士说：“将军，无需更衣”，因此亚尼当场摔了那位战士一巴掌。那位战士对将军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不礼貌。当亚尼走进卧室准备更衣时便遭到扫射。

至于其他将领被绑架的事，也许我的叙述同各类书籍所描述的内容相似，无论新秩序时期的版本还是苏哈托倒台后出版的书籍都类似，内容差不多，因此我不再赘述。

关键是，1965年10月1日凌晨发生的流血事件（9.30事件），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很清楚，这事件的实质不像陆军编造的神话那样，即称之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幕后操纵的政变，陆军的这一描述完全是错误的。这事件是由陆军法西斯将领们幕后操纵，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一种挑衅，是被狡猾地而又有效地被某些人操纵的挑衅，并且是由一位渴望权力和财富，身穿爪哇封建文雅服装的法西斯分子极度操纵的，这个人就是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少将。

在内部，这个事件不仅仅表明陆军领导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而且也是代表着资本主义愿望，依靠帝国主义扶持的保守的政治领导为一方，与代表着完全独立，社会民主公正的国家愿望，反对帝国主义为政治原则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对抗。

这个事件是声称议会民主制度中最民主的党派的政治领导人伪善面目的暴露，他们眼看着在自由民主制度中以和平方式取得迅猛发展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冲突中，陆军领导人及其同伙却以屠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来剥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生存权力并解散它。

从国际角度看，首先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前任大使约翰逊（Howard P. Jones）所散布的，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残杀人民的事件，这显然是人民的耻辱。事实上相反，这是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由苏哈托领导的，经过周密策划的流血阴谋的组成部分。

争分夺秒的时刻

1965年10月1日早晨，苏加诺在哈林（译注：Halim是空军基地），晚上他住在Slipi (Yaso 别墅) 其夫人Dewi Soekarno的家。大清早，他得到有关绑架将领的消息之后，他和巴尔多（Parto）副官一起启程前往总统府，然而临近总统府时，道路已被军队封锁。根据副官说，他们认不出该部队，因为原来没有制定封锁通往总统府的道路。

巴尔多很敏捷地主动采取行动，不再前往总统府，也许他预感到假如继续前往总统府将遇到危险。接着巴尔多提出建议说：“阁下，我们最好前往哈林，万一发生意外，

可以从哈林迅速飞往其他地方”。加诺兄依了他的建议。在保护总统安全的礼仪规定中有一条，假如警卫部队认为总统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飞机场是首选目的地，这样就可以以最快速度飞往任何地方。

这就是总统身处哈林的缘故。也许巴尔多（包括总统在内）并不知道诸将领被绑架并被带到哈林；抵达哈林后总统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过了一些时候，警卫队员才告诉他。又过了一些时候他从苏巴尔佐准将得到有关信息。

那天早晨艾地也在哈林。这就奇怪，非常重要的人物都集中在哈林。如果说吴玛尔·丹尼在哈林还有情可言，因为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空军领导人。但是艾地在哈林，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加诺兄和吴玛尔·丹尼同在一处，而艾地则在另外一处，但都在哈林附近。加诺兄飞到总统府之后（详情见后述），艾地飞到中爪哇。

几天过后，艾地在中爪哇 Boyolali 被雅西尔·哈迪普罗多(Yasir Hadibroto)上校的部下枪杀。根据官方报道，艾地被抓时由于反抗而被击毙。但根据我们情报员的报告，艾地完全没有反抗，“苏哈托确实命令军队干掉艾地”他说。艾地被杀了也就说不出真相了。

我更相信我们情报员的报告，因为后来艾地夫人说，1965年9月30日晚，他们家里来了几位部队客人，这些客人强迫艾地离开家。“我的丈夫被军人绑架”她说。此后艾地再也没有回来，直至后来得知在 Boyolali 被枪杀。

1965年10月1日大约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十一点，诸将领被谋杀后六小时，苏加诺总统从哈林空军基地通过无线电报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出指示，当时苏加诺只收到将领被绑架的消息，还没有得到将领们命运如何的消息，其实当时他们已经被杀害。

加诺兄指示的核心是要求所有各方面要保持冷静。“希望所有部队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就各位，所有部队只有由我作为总统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发布的命令才可以采取行动。所有问题将由政府/总统解决，要避免流血事件。”这是总统指示的其中内容。

苏哈托却对上述指示理解为翁东及其伙伴们已经失败，因为绑架和枪杀将领的行动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然后苏哈托命令其部下逮捕翁东及其同伴以响应总统的指示。

这当然让翁东疑惑不解，他明明已经向苏哈托汇报有关将领委员会要对苏加诺总统发动政变一事，翁东同时也表达了赶在将领委员会行动之前把他们逮捕之意。这一切都得到苏哈托的支持，而且苏哈托还提供部队援助，可是将领委员会成员被杀后，苏哈托却命令把翁东抓起来。

有关此事，我想起和翁东在芝玛墟监狱关在一起时他对我说的话。翁东坚信地说他不会处死，虽然法庭已经判他死刑。“因为是苏哈托支持我去打击将领委员会，我们甚至得到苏哈托的支持，从地方调来部队”翁东说。同是政治犯的朋友们都知道翁东是苏哈托的宠儿，但是翁东最终被处死刑，真的被处死。

几乎与总统发布指示的同时，或许几分钟之差，苏哈托召加诺兄在哈林的副官帮邦·威纳查尔哥（Bambang Widjanarko）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见苏哈托。这很可能与苏哈托下令抓翁东及其同伴几乎同时发生。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苏哈托叫帮邦把苏加诺带离哈林基地，因为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的部队在沙尔沃·埃狄·威博沃（Sarwo Edhi Wibowo）的领导下已准备向哈林发起进攻。

当帮邦向总统转达苏哈托口信时，加诺兄很愤怒同时也感到茫然。苏哈托不服从所有各方部队在各自岗位上各就各位的指示，苏哈托反而命令加诺兄离开哈林。假如加诺兄坚持留在哈林，风险肯定很大。反之，假如加诺兄离开哈林则意味着听从了苏哈托的命令。

接着加诺兄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征求意见，苏巴尔佐准将建议加诺兄飞往巴利岛；而吴玛尔·丹尼空军司令建议加诺兄飞到东爪哇的茉莉芬，雷门纳第二副总理说加诺兄必须谨慎，而最稳妥的措施还是前往茂物总统府。

从各种建议中加诺兄得出结论，情况危急，他必须离开哈林，最后加诺兄采纳了雷门纳的建议，决定经由陆路前往茂物总统府。临近傍晚时分，加诺兄的人马抵达茂物总统府。

情况属实，黎明前夕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的军队向哈林发动进攻。我估计这次进攻已经不是针对 9.30 事件中的执行者。因为正如我上面所述，执行 9.30 行动的部队有三分之二是苏哈托的人。因此这次进攻仅仅是针对当时正在处于不知所措的加诺兄，向他施加心理压力。在加诺兄的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受到军队施加的压力。

还是 1965 年 10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两点，苏哈托对昆佐诺上尉（Kuntjono 系总统卫队司令 Marokeh 中校的副官）表示过他本人是将领委员会的成员，当时诸将领已经被杀害，纳苏帝安作为被绑架的对象，逃过大难，正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受到保护。我得出结论，苏哈托敢于承认自己是将领委员会成员是坚信他的地位已很安全之后说的，因此他不必再掩盖自己的面目。苏哈托对昆佐诺说：“将领委员会确实存在，我是其中的成员。但是委员会是处理部队的晋级问题，而不是为了政变。”

苏哈托的这个态度表明他是个两面派。当翁东表示要除掉将领委员会时，苏哈托支持他甚至派了援兵，而将领委员会被消灭后，苏哈托表示他是将领委员会成员。苏哈托的表态使我想起了 1946 年 7 月 3 日他参与政变的行动，苏哈托总是脚踩两只船。

不同的是，1946 年 7 月 3 日的政变是失败的政变，而 9.30 事件是成功的一种隐蔽式政变（爬行式政变）的开端。在后一个政变中，苏哈托获得两个好处：他以英雄的面貌出现，及最终夺得国家的领导权。1946 年 7 月 3 日的政变中，苏哈托仅仅得到英雄称号，因为他歼灭了绑架夏里尔总理的集团。

然而就在那一天（1965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国内局势确实不稳定，个有关方面都在利用这一局势。关于绑架将领的第一号公告是由翁东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发布的，其主要内容是宣布企图发动政变的将领委员会集团已被粉碎，将领委员会的成员已经被绑架，苏加诺总统平安无事，政府暂时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并宣布了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名单中没有苏加诺的名字。

一个接一个公告在电台里回荡着，翁东接连几次宣布公告后，紧接着由吴玛尔·丹尼发布公告，社会大众感到茫然。大约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二十一点，苏哈托在电台里发表演说，并宣布当天早晨所发生的事，即由翁东领导的一伙人绑架一批高级军官，这一行动是对抗苏加诺总统的反革命政变，并宣布苏哈托本人接管陆军领导权，因为亚尼陆军司令已被绑架。

一天当中变化多端的消息，确实让加诺兄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谁在跟谁对抗，因为他不知道绑架将领委员会的计划。加诺兄对苏哈托宣布接管陆军领导权也感到奇怪，实际上数小时之前（白天），加诺兄已决定更换陆军司令的职务和职责，并任命普拉诺多·雷科索少将负责陆军司令的日常事务。

第二天，1965年10月2日，苏哈托由约卡·苏卡玛及其影子集团陪同到茂物总统府见加诺兄。苏哈托一伙人穿着迷彩服并配带武器进入总统府。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总统的警卫部队才可以配带武器进入总统府，然而，也许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同一般，允许他们带着武器进了总统府。苏哈托这次来总统府一事，从未在各种历史书籍或证人证词历史书籍中提及。

加诺兄接见了他们。主要是苏哈托表示不同意总统授予普拉诺多少将掌管陆军指挥权。除了反对之外，苏哈托还要求加诺兄授权他恢复治安，并要求总统对9.30事件中涉嫌的空军领导人采取措施。

由于问题很复杂，加诺兄延长了会谈时间，并召集了空军司令，海军司令，警察总长，普拉诺多少将及穆尔西少将。他们来齐之后才和苏哈托一起讨论有关苏哈托提出的所有要求。会议很艰难地进行了约五个小时，最后加诺兄授予苏哈托恢复治安司令。

这是苏哈托在一系列的隐蔽式政变（爬行式政变）过程中夺取的初步胜利。授予苏哈托恢复治安的授权书在当时并不是第一份发出的授权书，且从未载入史册，倘若载入史册也许会觉得离奇。总统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掌握着军队的控制权。此之前一天刚发生将领委员会被杀事件，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总统已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发出指示，这表明总统还掌握着军队的控制权，甚至总统还接管了陆军司令部的权力，因为当时陆军司令亚尼已被绑架。因此，苏哈托到总统府要求授予他恢复治安权，如果不是剥夺总统的权力又是什么呢？

但是，最终总统还是授予他委任状。根据约卡的回忆，委任状的签发过程非常艰难，在会上，苏哈托向总统施压。假如我们回顾此之前一天苏哈托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声称他已接管陆军领导权，那么发出委任状是很自然的。但在委任状签发之前苏哈托就已敢于接管陆军领导权。

在苏哈托和影子集团离开茂物总统府之前，苏哈托宣布，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总统离开茂物总统府，从此，苏加诺已成为苏哈托的俘虏。

当亲苏加诺的助手们醒悟到苏加诺已成为苏哈托的俘虏之后，他们突然想起前往茂物总统府的建议是雷门纳提出的。苏巴尔佐准将不是建议加诺兄去巴利吗？吴玛尔·丹尼空军司令建议去东爪哇的茉莉芬？雷门纳建议最谨慎还是去茂物总统府。因此，在苏

加诺的亲近着中议论纷纷，假如加诺兄听从苏巴尔佐或者吴玛尔·丹尼的建议，情况肯定将是不同。

我深信，雷门纳确实没有别的意图，更不用说陷害加诺兄，他是个忠于总统的人。到茂物总统府的建议确实是谨慎的措施，不仅仅因为距离较近（与巴利或茉莉芬相比），茂物总统府本身就是总统居住的地方，而且那是国家的象征。谁会想到苏哈托敢于前来见总统，并在那里俘虏了加诺兄？

然而，由于议论传开，并对雷门纳的建议表示遗憾，次日，雷门纳来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见苏哈托。他的目的是提醒苏哈托对总统的态度不要那么强硬。雷门纳对苏哈托说：“别这样嘛”。但是，苏哈托怎么回答？“，雷门纳兄，你别插手，你管你自己的职责，现在是我掌权”。听吧此话，雷门纳退去。此后不久（还是当月），轮到查鲁尔·沙雷第三副总理去见苏哈托，他的目的和雷门纳一样，苏哈托的回答也和上述一样，他说：“现在是我当权，查鲁尔兄不要插手”。

好厉害，没多久，苏哈托驳斥（否认）了从总统那里接到授权书一事。他大概是这样说：“在军队生活中不可能有两个司令员（总统指定任命暂时行使陆军司令职权的普拉诺多和苏哈托）同时被任命”。实际上对任命普拉诺多少将为暂时行使陆军司令的职权完全没有执行，相反，苏哈托作为恢复治安和秩序司令却一直行使权力，以至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精英界的动荡不安。这就是隐形政变的开端，自此后，加诺兄实际上已经再也没有权力领导国家。

次日，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及家属的屠杀开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指控为 9.30 事件的操纵者，此后印度尼西亚血流成河。遭到围剿的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知名人士，而且所有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色彩的，不经法律程序都被杀害。在城市，农村，山村，在全国各个角落进行了大规模的令人恐惧的屠杀。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屠杀始于苏加诺总统确认并宣布（1965 年 10 月 3 日）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苏哈托少将为恢复治安和秩序行动司令部后不久，没有料到这个法律以外的机构日后变成了人民惧怕的机构，只要提到恢复治安和秩序行动司令部这个名称，人们就会感到恐惧。数年后其名称改为国家安定统筹机构，但仍然为民众所惧怕。所有不符合苏哈托意愿的社会行动肯定遭到恢复治安和秩序行动司令部（后更名为国家安定统筹机构或地方国家安全统筹机构）镇压。这个机构变成了苏哈托消灭那些不同意愿的人的工具，这个事态的发展，当然是作为授权者的加诺兄始料未及。

1965 年 10 月 16 日苏加诺总统任命苏哈托为陆军司令代替亚尼的职位。接着 1965 年 10 月底遵照苏哈托的命令在高教部和科学部长夏理夫·泰瑜（Syarif Thayib）准将的家里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指挥部，这是得到军队支持的学生运动萌芽期。此后，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指挥部经常进行游行示威并得到陆军突击团和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的支持。

在一些有关 9.30 事件的历史书籍中常提出许多疑问，为什么苏加诺总统不支持 9.30 事件？按理说，假如将领委员会企图发动政变，而后被总统卫队枪杀并得到苏哈托指派的援兵的帮助，加诺兄听到将领们被绑架后，应直接支持 9.30 事件，但是加诺兄为何反而终止了该行动？答案是：因为加诺兄不知道绑架将领的计划。这也同时回答了

诸将领被谋杀后数小时翁东宣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里为什么没有把加诺兄的名字列入其中的缘故。这个革命委员会是翁东自作主张的，没有和总统商量过。

1965年10月1日的悲剧事件，对于苏哈托来说，可谓一举四得：

1. 改变了将领委员会集团确实存在，而苏哈托是它的其中一位成员的事实，使它成为某种虚构小说。
2. 又反过来，将虚构变为现实，于是真正发动政变的不是将领委员会，而是由翁东领导（实际得到苏哈托支持）的9.30事件。
3. 肃清了成为苏哈托集团潜在对手的亚尼集团。
4. 为苏哈托提供以英雄面貌出现的机会，并最终的确实现了。

纳苏帝安的命运

纳苏帝安于2000年9月6日临近本书出版之际离开人间，并以军礼仪式安葬在雅加达Kalibata烈士陵园。但原至高无上的真主接受他的灵魂，阿门。亚尼逝世后，纳苏帝安是军衔最高的军官，当时他已拥有四个星级，而苏哈托才三个星级。当印度尼西亚国军/陆军于六十年代分裂（非明显方式）成几个阵营时，纳苏帝安阵营为亚尼阵营和苏哈托阵营所惧怕。当时许多政治家认为印度尼西亚国军纳苏帝安中将最适合接替苏加诺总统。他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很闻名，他有崇高的奉献精神，他是9.30事件中被绑架的目标之一（他逃脱了，但女儿牺牲了），因此理应拥有英雄称号。

除了在军事方面很有经验，纳苏帝安政治上也很成熟。他是通过军队中间道路首创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双重职能思想的人。他对于利用军力来互相协调进行政治演练方面很有经验，使军队能有效地进入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构。

在当时诸多高级军官中，苏加诺总统最怕的就是纳苏帝安，这是鲜为人知的。苏加诺总统称他为“国中之国”方案的首创者，这意味着他敢于反对加诺兄的政策（请见第二章）。即使亚尼在世时，广为流传的猜测就是，假如加诺兄离开人间或不再有能力领导印度尼西亚，那么接替他的最合适人选是：亚尼或纳苏帝安，他们当总统的机会是均等的。

但是，纳苏帝安被苏哈托“玩弄”，他和亚尼一样，对将领委员会的传闻没有警惕。他确实没有提防该传闻会导致发生各种事的可能。他的确不知道，甚至没有料到，军阶比他低的苏哈托可以成功“挑拨”到翁东中校攻击将领委员会，并险些夺去纳苏帝安的生命。由于目标打偏了，导致阿蒂·伊拉玛·苏尔雅妮·纳苏帝安(Ade Irama Suryani Nasution, 译注：纳苏帝安的女儿)作为民族的花朵牺牲了。

问题是，陆军在采取各种重要步骤时，苏哈托为什么不把纳苏帝安卷入呢？回答是：苏哈托的确利用纳苏帝安作为诱饵，吸引各种受到纳苏帝安影响的，无论是军队或是民间的反共力量。另一方面，苏哈托利用纳苏帝安恐吓加诺兄，因为他知道纳苏帝安是最敢于反对加诺兄方案的人。

我说苏哈托采取一些重要步骤时不让纳苏帝安卷入其中，当然是有事例的，其中之一就是根据我得到的如下准确消息：自从纳苏帝安逃过被绑架之后，大约印度尼西亚西

部时间上午九点他见到了苏哈托几乎同一时间，1965年10月1日上午，苏哈托命令陆军高级军官们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集中并开会，但是苏哈托向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部求助，把纳苏帝安藏匿起来，其目的似乎是为了保护尚在9.30事件追捕中的纳苏帝安的安全，所以纳苏帝安没有参加上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会议。

根据约卡的回忆，会议中苏哈托明确表示刚发生的对诸将领的绑架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幕后操纵的。苏哈托还成功地邀约陆军突击兵团指挥沙尔沃·埃逊·威博沃使他的部队团结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旗下一起歼灭9.30事件执行者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会议还讨论了总统向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发出的指示，即所有的部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得到总统的命令（查看“争分夺秒时刻”一节）。

最后会议一致同意拒绝总统的命令，理由是被绑架的将领的命运尚未明确，对绑架者的追捕行动已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准备就绪，假如陆军司令（亚尼陆军司令被绑架）不在，则由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替代，也就是苏哈托指定由他自己替代（在前一部分曾叙述：当晚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电台宣布他接管陆军领导权），因此会议决定再没必要服从总统接管军队领导权，及指定普拉诺多少将为暂时行使陆军司令职权的决定。

会议做出许多重要决定后，苏哈托即命令其部下把纳苏帝安从藏匿处接出来，并把他带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纳苏帝安抵达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时，精神仍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刚从被枪杀中逃脱出来），他直接被带进会议厅，此时与会者全还在集聚一起。当日下午会议即将结束时，纳苏帝安仅被告知会议是从上午开始进行的，并即将结束。其实各项决议几个小时前已经完成。

苏哈托通过这种方式赢得纳苏帝安半日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半天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在此事件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这次会议决定着9.30事件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局势。显然纳苏帝安对于没让他参与会议没有生气，因为，第一，叫他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意味着他必须尊重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从纳苏帝安被苏哈托藏匿起来的做法，然后又带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也许使他感到似乎成了苏哈托的俘虏，更何况他从一系列的枪击中逃脱出来后，精神仍非常紧张；第二，会议已经接近尾声，而他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看出苏哈托狡猾地把纳苏帝安带进会议厅，让人觉得纳苏帝安也同意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此外，这一措施让大众产生一种印象，即连纳苏帝安都被带到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并受到苏哈托的保护，这就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苏哈托的地位是在纳苏帝安之上，同时也增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9.30事件幕后操纵者”的假想，因为纳苏帝安是以反共而闻名。这同时又吸引了无论是军队还是民间的反共力量倒向苏哈托一边。最要害的是，苏哈托已经把纳苏帝安当时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的出现当作魔鬼来恐吓苏加诺总统。

在会议结束之前，纳苏帝安有一句话是针对苏哈托说的，这句话是：“最好苏哈托少将能尽快恢复治安使社会安定”。这句话他只是“即兴”说出，他渴望尽快采取措施稳定社会（或许也为了纳苏帝安自身的安全）。但是，对于苏哈托来说，那句话意味着“所得多于所求”。苏哈托确实正在等待有人授予他权力，纳苏帝安的话促使他向苏加诺总统要权。等不了太久，第二天他和约卡以及其影子集团便一起启程前

往茂物总统府见苏加诺总统。在那里苏哈托强迫加诺兄授予他权力。最终苏哈托确实得到他想得到的：成为恢复治安和秩序司令部司令。

五 第三章：权力易手

大学生的角色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或者大约有六个月时间,印度尼西亚的领导层有个空缺期。加诺兄仍然是总统,但不再拥有权力了,他被禁止离开茂物总统府或更准确地说成了苏哈托的俘虏。在这一时期,政府也没有做出重要的决议。虽然的正式职务是陆军司令,但他更多的是制定国家政策。

加诺兄在这其间尚未完全丧失他的政治生命,无论在武装部队或大小政党方面,他仍然还有影响力。各政党的领导者普遍支持陆军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然而他们也支持正在尽力恢复权威的加诺兄,虽然他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很密切。

大致上各个政党的领导人的态度都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另一方面他们支持加诺兄。而武装部队方面,总的来说也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但有一部分支持加诺兄。总的来说,在过度时期,一部分军官对于他们自己的地位感到忧虑,他们不知道将来如果苏哈托成为领导人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另一方面,隐蔽式政变(爬行式政变)的过程尚未结束,苏哈托夺取最高权力的演习分四个阶段。第一,铲除强有力,同是高级军官的竞争对手;第二,消灭和加诺兄有密切关系的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三,把作为总统助手的部长们搞垮;第四,最后使加诺兄无能为力而瘫痪。

为何要分四个阶段呢?答案是:9.30事件前,苏哈托在诸多军官中排不上号,由于他不单军衔低,只是少将,加上在中爪哇走私物品时也有污点,所以想要达到最高领导层,他必须经过漫长的过程。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他的对手诸将领已经被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被摧毁。即便如此,加诺兄仍有影响力,部长们还在,虽然已经不起作用。

为了达到抗衡,更准确地说为了把加诺兄剩余的势力搞垮,苏哈托发动了大学生。正如前面提及,1965年10月底以苏哈托的名义命令在夏里夫·泰瑜准将家里组建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指挥部。此后,得到军队支持的大学生采取示威游行活动评击苏加诺总统。从那时起,出现了人民三项要求的口号,第一,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清除内阁成员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分子;第三,降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

加诺兄尚担任总统职务,他立即解散了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指挥部,但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指挥部解散后,又出现名为印度尼西亚青年和学生统一行动指挥部的同一性质组织。其目的还是一样,进行示威游行评击苏加诺总统。而且,由于游行示威得到军队的支持,青年和大学生们当然很勇敢。后来称他们为六六年代青年团,是由苏哈托倡议组织的团体。

当时，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我确切了解造成物价飞涨是苏哈托策划的。准确的说，苏哈托得到两位华人企业家林绍良（过去曾和苏哈托合伙走私物品）和郑建兴（也是苏哈托在中爪哇时的朋友）的帮助。其做法很简单，由上述两位企业家及他们协调的一批企业家控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大米，糖，油，面粉等，囤积起来，然后把它销毁，造成市场物资紧缺，物价自然就暴涨。

此事发生在 1965 年 10 月至 1966 年 3 月期间，后来酿成百分之六百的通货膨胀，国家财政预算赤字更加严重，达百分之三百，人民受折磨，人们需要排队买米，糖，油等。这是一次得逞的导致国家经济瘫痪的谍报活动。

有关苏哈托和林绍良及郑建兴在中爪哇的生意来往，普拉诺多少将最清楚。当时苏哈托任蒂博尼哥罗司令员，普拉诺多是他的参谋长。普拉诺多对苏哈托在林绍良和郑建兴的帮助下，利用职权做生意谋私利之事感到非常恼火。

很有可能过去苏哈托和林绍良走私货物的行为是普拉诺多揭发的，最后亚尼陆军司令知道此事，以至亚尼摔了苏哈托一巴掌。因此，苏哈托阻止苏加诺总统任命普拉诺多为暂时行使陆军司令职务（1965 年 10 月 1 日），不仅仅是为了争权夺利（以卑鄙手法），而且其中含有报私仇的因素。

与此同时，向政府请愿的大学生运动持续不断，他们几乎每天不断地高喊人民三项要求。苏哈托策划操纵，使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同时又是他唆使大学生们示威游行要求降低物价，百姓显然支持大学生们的行动，因为他们的愿望与人民的愿望相吻合。

无论谁当总统，在当时肯定做不了更多的事，何况苏加诺总统已被拘禁，不准离开茂物总统府。苏哈托诡计多端的面目此际更加暴露无遗。苏哈托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手段确实有效，虽然当时在人民还无法识破。

据我分析，只有部分大学生的动机是真正出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造成生活困难而出来示威游行，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小孩。他们当中的部分人肯定知道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是由于苏哈托策划操纵的，他们是密切关注国家发展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运动得到我们民族两种主要力量，即军队和人民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了解实情的大学生不敢反潮流，大家都名哲保身，他们不得不随大流，跟着反政府。

1966 年 1 月 10 日，数千名大学生在 Salemba 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聚集，他们高喊人民三项要求。沙尔沃·埃逊陆军突击兵团（后改名为特种部队）司令在数千名大学生中发表演讲，煽动大学生们示威游行。沙尔沃演讲结束后，数以千计大学生走上街头前往文教部提出上述要求。他们在文教部见到了查鲁尔·沙雷第三副总理，大学生向查鲁尔表达他们的要求，查鲁尔只是随便应付他们的要求。

接着大学生们继续上街游行，报纸舆论称大学生的要求是纯洁的，这显然是误导民众。基本生活资料是苏哈托有意销毁的，另一方面，大学生们采取的行动又得到苏哈托领导的军队的支持，这怎能说他们的要求是纯洁的呢？大学生们唯一纯洁的要求，据我的看法是：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举个例子，后来当苏哈托掌权及其政治利益得以实现后，他禁止大学生发表言论。他的手段是指使文教部长发布“校园生活正常化”及“大学生协调机构”，的政令，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大学生示威游行，这是1970年中的事。我在监狱中密切关注这一消息，并观察到苏哈托对他曾使用过的武器之一：大学生，感到恐惧。最后他也摔了个嘴啃泥下台了，其中原因就是由于数以千计大学生于1998年5月中旬占领了国会/人民协商会议大厦后施加压力的结果。

我对六六年代的青年和大学生的态度从未感到遗憾。当时国家的状况和形势使他们有可能持这种态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青年一代总是倾向于改革一边，这一特性被渴望权利的人所利用。何况，自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事实上就是苏哈托，虽然法律上他是陆军司令。

加诺兄仍然还是印度尼西亚总统，政府也仍然存在，但国家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无论是对于军队为肃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人民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或者对于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状况均失控。人们不难看出，这是由于受到策划操纵或是纯属政府无能的结果，人民亲眼目睹了加诺兄从最高领导下台的悲剧。

然而，加诺兄对大学生运动做出了反应。1966年1月15日，在内阁会议上，苏加诺总统发表了讲话，回答了大学生们煽起的人民三项要求。苏加诺总统认为，人民三项要求是印度尼西亚军队/陆军策划操纵的结果。请听我把我来得及记录下来的苏加诺总统部分演讲简说如下：“我决不会后退半步，我仍然是革命的伟大领袖。我不说别的，来吧，谁需要苏加诺，谁同意苏加诺作为革命的伟大领袖，那么，把你们的全部力量团结起来捍卫苏加诺。请站在苏加诺一边，等待命令……”。

这是苏加诺在公众面前发表的最强硬声明。加诺兄慷慨激昂的演说，使所有各方感到不安。加诺兄还拥有支持者，包括来自武装部队。他的部长们都还完整，他的职务仍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因此各方都担心印度尼西亚近期即将进入非常动荡时期，并将发生比9.30事件更大的流血事件。

第二天晚上，我作为第二副总理组织了苏加诺阵线，成员都是部长，目的当然是为了捍卫总统。原有的民族阵线必须加入苏加诺阵线。

1966年1月20日，部长们在总统府聚集，他们表示愿意站在支持苏加诺队伍的最前列。这是支持苏加诺为恢复其原有地位做出努力的一部分。按常规，苏加诺还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那么，按常规，站在最前方的支持者也还是部长们。

但是，苏加诺并没有穷追到底，他发表强硬演说后并没有进一步措施，没有任何指示。虽然他知道他的支持者已做好准备捍卫他，但他的支持者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在加诺兄的演讲中，他呼吁：等待命令……。其支持者遵守着这号召，但实际上从未有任何命令下达。假如真的下达命令，我不能想象印度尼西亚将变成什么样。“**3月11日命令书**”（**Super Semar** 即 **Surat Perintah Sebelas Maret** 的缩略语）

我得到的信息是，1966年3月10日苏哈托在其H.阿古斯·沙林街的家中举行见面会，出席会议的有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阿米尔·玛哈穆德（Amir Mahmud）少将，东爪哇军区司令巴苏基·拉赫玛德（Basuki Rachmat）少将和尤苏夫（M. Jusu）少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苏哈托作为陆军司令，寻求众将领支持他获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授予他全权，以克服国家面临的困难，此外也为了创造安全和政治稳定的环境。前来会见苏哈托的三位将领同意陆军司令的这个想法。

接着，苏哈托发表重要讲话，他慷慨激昂的讲话批评了不稳定的国家形势，而部长们却没能解决民族问题，他们只是在各种会议上讲讲话而已，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他呼吁雅加达，万隆及茂物的大学生们可以于次日（1966年3月11日）在雅加达召开的内阁会议期间进行示威游行。

结果非同寻常。大清早，会议召开之前，数以千计大学生成群结队地涌向总统府的院子里，总统卫队设法把他们拦在总统府的围栏外，值勤人员不得不向空中鸣枪以示警告。

情况难以为总统卫队所控制。苏哈托不仅发动大学生，同时也指使军队提供援助（后来我知道有三个营的陆军突击兵团，并得到由可玛尔·易德里斯（Kemal Idris）领导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部队的支持），他们的目的，其中要逮捕我，苏哈托也同意了。

军队都穿着迷彩服，装备齐全，但没有身份标志。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分散在出席会议部长们必经之路，一看到部长的汽车，他们就拦车，放掉轮胎的气。总统府也受到如此围攻，没有身份标志的部队与总统卫队近距离对峙。

我得出结论；苏哈托如此做是希望苏加诺总统无条件投降。情况确实危急，因为将发生大规模的牺牲。我认为，苏哈托是冷血杀手，他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忍心杀死任何人。可以想象，假如总统卫队在当时采取强硬措施驱赶大学生们，肯定将发生非常严重的流血事件。因为，大学生们觉得他们得到军队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将殊死坚持到底，总统卫队和无身份标志部队之间的巷战可能也就会发生。好厉害，此次内阁会议，苏哈托以咳嗽为由缺席。苏哈托生病的消息是此后不久由阿米尔·玛哈穆德传达的。根据阿米尔供认，参加内阁会议后，他和巴苏基·拉赫玛德及尤苏夫一起来到苏哈托家里。“苏哈托咽喉疼，因此不能大声说话。当我们来到他家时，他还穿着睡衣，裹着脖子”阿米尔说。但是我的一位情报员向我汇报说，当天下午苏哈托在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主持召开会议。很清楚，苏哈托是个大骗子。

假如苏哈托出席内阁会议（作为陆军司令他应该出席会议），那么苏哈托将面临三个风险：

- 第一，在总统府被大学生和军队包围的情况下，会上苏加诺总统必然会质问苏哈托：“哈托，我已任命你为恢复治安和秩序司令，快采取行动处理那些捣乱分子。”总统的责令，对苏哈托来说，意味着将自食其果。使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 第二，如果苏哈托执行命令，那么他的名声将在他亲自发动的示威者里一落千丈，对纳苏帝安来说，这意味着是出来当总统的好机会。
- 第三，假如苏哈托在内阁会议上拒绝执行命令，那么对苏哈托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加诺兄肯定会当场命令总统卫队立即逮捕苏哈托。

为避免可能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对苏哈托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病”。这不是证明苏哈托是狡猾和冷血杀手吗？他对他指使数以千计大学生和军队的行为将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导致本民族血流成河的后果完全置之不顾。

1966年3月11日的内阁会议由苏加诺总统主持召开。在一些书籍里写道，苏加诺总统宣布开会后不久，总统的警卫人员萨布尔（Sabur）准将把一张纸条递交到总统的桌面，内容很简短，“外面有许多不明身份的部队”。过不久，总统离开总统大厅走出去，会议交给雷门纳主持，我就跟随总统走出去。有许多记载说我由于匆匆忙忙连鞋子都没穿。

确实如此。以往，内阁会议上，也许因为久坐闷热的缘故，诸位部长常把鞋子脱掉，但由于有桌子挡住，与会者看不到，我也习惯这样做。在情况紧急以至总统突然离开会议时，我急匆匆跟出去，因此来不及穿鞋子。

一走出会议厅后（这些事历史书籍上都没有记载）我不知道所措，该往何处去？我得到消息，上述“不明身份部队”在紧盯着我，实际上我一走出会议厅，没有看到比我先走出来的加诺兄，茫然之下我看到一辆不知是谁的自行车，顾不得多考虑，就骑上那辆自行车。因为我的汽车，都被示威者放了气。

在总统府周围喧闹的情况下，我骑车出来，竟然没人知道我就是那些军队正紧盯着的苏班特里约。我骑着自行车，从有节奏地高喊人民三项要求和各种谴责加诺兄口号的数以千计大学生和军队旁边经过，说实话，我一直低着头踩着自行车踏板，倘若有细心人注意的话，肯定会把我认出来。

我的自行车一直往南行驶，我的目标是回家。骑到圆形喷水池处（印度尼西亚银行十字路口）。我看到如此众多的大学生和军队，他们不仅在总统府周围，而且密集在潭林街（Jalan Thamrin）一带，此时我感觉不对劲。到目前为止，我的确已经逃脱出来了，但是我还能逃得过像蚂蚁一样集聚在那里的大学生和军队吗？因此我当机立断调头返回总统府。好极了，我回到总统府且没有被示威者发现。

一些历史书籍写道，从会议厅出来，我直追加诺兄上了直升机，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返回总统府时，看见有一架直升机，我不知道该直升机是原先就有的还是刚刚到的，或许因为我恐慌，没有看到直升机早就在那里。然而让我欣慰的是，不久后我看到加诺兄在副官的陪同下走上了直升机。因此，我随即丢下自行车，向直升机跑去。也许就在此时，当我光着脚跑向直升机时被许多人看到了。所以许多报纸报道说：“苏班特里约博士光着脚跑向直升机追赶加诺兄”。我终于上了直升机，并和加诺兄一起飞往茂物总统府。

事实上，加诺兄一离开会议厅并没有直接走到直升机处，中间还间隔一段较长时间，此时我已经踩着自行车从总统府骑到圆形喷水池处又返回来。也许离开会议厅后加诺兄和副官及军事顾问们碰头研究，分析形势。此事对我有利，假如我没有见到加诺兄，我的命运将不知如何。

发生这事后，我沉思。当时我和雷门纳幸好从他们逮捕的目标中逃脱出来。假如我被逮捕或被杀害，势必发生激烈的冲突，加诺兄和仍然忠于他的部队不会袖手旁观，结

果必将血流成河。假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苏哈托肯定会反过来背叛本来是他指派的，包围总统府的朋友们和部队。1946年7月3日政变图谋失败，证实他是如此，苏哈托支持翁东中校枪杀将领们也证明他是如此。

临近傍晚，三位将领（即巴苏基·拉赫玛德，阿米尔·玛哈穆德和尤苏夫）来到总统府，当时三位副总理（我，雷门纳和查鲁尔·沙雷）已在那里。雷门纳和查鲁尔通过陆路追赶我们来到茂物总统府，我们三人有暇在厢房休息。当三位将领到来时，加诺兄在首座大楼接见他们，他们谈话时间相当长，诸副总理只好在厢房戒备。数小时后，加诺兄把我，查鲁尔和雷门纳叫到会客室，三位将领就在那里，但是当我们进去时，加诺兄和他们之间已经达成共识。

我走进会客室，加诺兄正在看文件，巴苏基·拉赫玛德，阿米尔·玛哈穆德及尤苏夫坐在他的对面。然而加诺兄把刚看的文件递给我，查鲁尔坐在我身旁，文件的确切内容我记不清了，但主要内容有四项，苏加诺总统授权苏哈托：第一，维护雅加达地区及其周围的安全，为此，他必须和其他派别的势力建立互相协作关系；第二，授权人有义务向总统汇报他将采取的一切措施；第三，授权人有义务保护总统及其全体家庭成员的安全。第四，授权人有义务维护和继承苏加诺的教导。先后顺序可能会有所颠倒，但主要内容是那样。

“班，你看怎么样？你同意吗？”加诺兄问道，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想，加诺兄是希望我表示同意，但事实上我内心并不同意。总统不是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吗？而且国家安全的控制权理应掌握在总统手里，我感觉到加诺兄已受到压制。就以“保护总统及其全体家庭成员的安全”这句话为例，这意味着总统的安全已受到威胁，受到逼迫他签发文件一方的威胁。但是，在新秩序版本的历史书籍里，没有这独特的句子。甚至更严重的是，这份指定苏哈托成为“3月11日命令书”（内容是没有通过大选和人民协商会议选举程序，苏哈托便当上总统）守护者的原件（即“3月11日命令书”的原件）现在却不见了，这么重要的文件现不知在何处。

“班，如何？同意吗？”加诺兄又问道。

“是呀，该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没有参加总统阁下的会谈。”我回答说。接着加诺兄打断了我的话，“但是，你同意吗？”

“如果行的话，只用口头命令”我鼓起勇气说。我瞟了大家一眼，三位将领瞪眼看我，但我不怕。他们听了我的最后一句话肯定很恼火，但是我知道，他们奈何不了，我感到当时的气氛很紧张。

后来阿米尔·玛哈穆德插话：“阁下，就以真主的名义，签个字吧”。

看来刚才会谈时加诺兄已受到三位将领的压制，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拿不定主意，但好像很希望我们同意以示支持。

最后，我同意了，查鲁尔和雷门纳也表示赞同，加诺兄就签了字。三位将领直接启程返回雅加达去见指派他们的苏哈托，加诺兄邀请他们共进晚餐，他们都拒绝了，“对

不起，阁下，因为天很晚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回答说。他们喜气洋洋地带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即后来称之为“3月11日命令书”）离开了。

第二天，1966年3月12日，苏哈托直接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寻常的是他引用1966年第113号总统决定书的名义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众公布时，宣读的文件已由苏加诺总统签署。六天后，十五名在职的部长们被逮捕，当然苏哈托事先没有向总统汇报。就连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文件到午夜才到苏哈托手中，但他次日白天就可直接采取上述措施。至于逮捕十五名部长的理由是：为了不让部长们成为失控的愤怒民众的牺牲品。但是，他又表达了自相矛盾的理由，即部长们只不过是总统的助手，而不是集体政权机构，因此完全可以逮捕。显然，部长们被抓后当即被关押，指控理由很简单：卷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9.30事件——这是苏哈托当政时期所有印度尼西亚人民最惧怕的指控，只要批评苏哈托政府的政策就会被指控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1966年3月11日命令书被歪曲，苏哈托的阐释是：加诺兄将政权移交给苏哈托并非一项恢复首都治安的命令。我作为确切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我深信苏哈托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逮捕十五名部长是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一系列计谋的组成部分。如前所述，苏哈托的计谋有四个阶段：消灭竞争对手——将领们；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撤掉部长们的职务；最后才是推翻加诺兄。现在苏哈托已实现了三个阶段，只剩下最后阶段了。

加诺兄也做出反应，如果说加诺兄只保持沉默，那是不对的。他命令雷门纳去见苏哈托质问上述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命令书只是为了维护雅加达的治安，而不是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怎么反而乱抓人呢？”雷门纳对苏哈托说。

但是苏哈托却不予理睬。情况就像发生在1965年10月3日的事情一样，当时因为加诺兄在茂物总统府被软禁。雷门纳向苏哈托抗议，苏哈托声明：“雷门纳兄，你不要插手，现在是我掌权”。

雷门纳回到茂物总统府汇报了苏哈托的反应，加诺兄没有作声，但是，从他的面部表情可明显看出他在生气。从雷门纳的汇报我们知道当时的雅加达局势非常紧张，坦克和装甲车在各街头戒备，到处都有军队，他们是闻名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部部队和Siliwangi伞兵旅三营部队。这次是为了吓唬当时党员数量还相当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可能针对失去权力的加诺兄施加精神压力，叫他不许阻挠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措施。或两者兼有。

十五位被逮捕的部长是：

1. 我本人（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和中央情报部部长）
2. 第二副总理（译注：原文如此）查鲁尔·沙雷
3. 电力部部长斯迪阿地·雷克素普罗佐工程师（Ir. Setyadi Reksoprodjo）
4. 基础教育和文化部部长苏玛尔佐（Sumardjo）
5. 国务部长黄祖德（Oey Tjoe Tat）
6. 中央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龙苏夫·穆答·答兰（Yusuf Muda Dalam）
7. 矿业部部长阿尔穆南多（Armunanto）
8. 水利和农村部部长苏拉赫曼（Surachman）
9. 劳工部部长苏多莫·玛尔多普罗佐（Sutomo Martoprodjo）

10. 司法部部长 Mr. 阿斯特拉威纳达 (Mr. Astrawinata)
11. 宣传部部长阿芝玛迪 (Achmadi)
12. 安全事务部部长伊曼·夏飞中校 (Letkol Imam Syafei)
13. 民族阵线秘书部长 J. 杜玛卡法学士 (J. Tumakaka, SH)
14. 移民和合作社部长阿查迪 (Achadi)
15. 内务部长兼大雅加达市市长苏玛尔诺·沙斯特罗威佐哟 (Sumarno Sastrowidjojo)

即使逮捕了还在职执行任务的十五位部长，但苏哈托还恬不知耻地表明他的权力是通过合法手续得到的。其实逮捕我们（部长们）时，苏哈托是这样对执行任务的军队说的：“先把他们抓起来，理由以后再说”。

这就是苏哈托的暴力逻辑哲学。犹如苏哈托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悲剧中所做的一模一样，将领们被杀害后数小时，苏哈托影子集团立即宣布：9.30 事件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幕后操纵的，然后苏哈托命令：“先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消灭掉，证据以后再找”。这难道是就像苏哈托执政时期经常说的：“符合宪法规定”吗？

信步入宫（悠然自得步入总统府）

现在离最后推翻加诺兄的阶段只剩下半步了。“3 月 11 日的命令书”之事发生后，当苏哈托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逮捕忠于加诺兄的部长们时，实际上加诺兄已经被打倒一半了。他已毫无办法，况且在职的部长们都被逮捕了，因此，他离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已指日可待。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式被解散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位主要领导人，即艾地，约多和鲁克曼公然被逮捕。已经失去权力的苏加诺总统拒绝下令审判（不知为何）他们。后来苏哈托接管了这个问题，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审判了这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苏哈托下令军队处决他们三人，而他们三人确实没有通过现行的法律程序就被枪毙。

苏哈托如此做法，假如我说他不想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位领导人在法庭审判会上揭开他的假面具（操纵 9.30 事件），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经历了全部过程的我，确信苏哈托参与了 9.30 事件。

“3 月 11 日的命令书”之事发生后，苏哈托改组了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组成部分的合作内阁成员，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所站的席位改由苏哈托自己人代替。然后苏哈托指使临时人民协商会（其中绝大部分成员已由苏哈托亲信填补）召开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以具法律效力方式巩固“3 月 11 日的命令书”。

与此同时，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大规模屠杀也变得合法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朋友，甚至有的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毫无关系的百姓也遭到屠杀。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他们的家属及朋友们流血成了正当，合法，这是整个印度尼西亚历史时期规模最大的大屠杀。没有人精确了解有多少百姓被杀害，有人说八十万，也有人说一百万，最高的数字是沙尔沃·埃逊·威博沃宣布的，他说达到达三百万人。

在 1966 年 6 月召开的临时人民协商会上，苏哈托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折不扣地坚决恢复 1945 年宪法，同时下令取消 1963 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任命加诺兄为终生总统的规定。他还宣布，授予加诺兄“伟大的革命领袖”称号是不具法律依据。众所周知，当初任命加诺兄为终生总统，不是源于加诺兄本人，也不是源于忠于他的支持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任命是源于陆军军营本身，即苏哈尔迪曼(Suhardiman)准将的建议。

1966 年 7 月初，苏哈托同意纳苏帝安任临时人民协商会主席，数日后，1966 年 7 月 5 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做出决定：苏哈托作为“3 月 11 日的命令书守护者”赋予他组阁权力，因此他组成了“人民疾苦呼声”内阁，替代“两项人民命令”内阁。这个新内阁不再是苏加诺总统政权所领导，而是在苏哈托为内阁主席团主席的领导下。此后，苏加诺总统政权正式结束。

刚被选为临时人民协商会主席的纳苏帝安立即唱起了苏哈托影子内阁集团创作的歌曲。纳苏帝安上任之前产生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议，即有关要求苏加诺总统向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在 9.30 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补充说明，随后宣告此后不再有效。1966 年 12 月空军司令吴玛尔·丹尼被逮捕，紧接着其他支持加诺兄的军官们也被捕，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罪行被判刑多年。

后来的进程就是苏哈托确实领导了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缓慢但必然的悠然自得步入总统府办公室，苏加诺（传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对他发动政变）政治上已毫无办法。根据 1966 年第 10 号法令，合作内阁及临时人民协商会要求总统对 9.30 流血事件承担责任，加诺兄拒绝了，因为加诺兄认为，根据 1945 年宪法，他作为由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授权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是国家的方针大计问题，而 9.30 事件是在国家方针大计以外，即是说不能向总统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

从此以后加诺兄正式被禁止发布各项规定或条例。自 1965 年 10 月 2 日起，加诺兄已经非正式地被关押在茂物总统府。由苏哈托倡导，纳苏帝安支持的陆军拥护

苏哈托不折不扣地和坚决地恢复 1945 年宪法的决定。与此同时，苏哈托命令临时人民协商会主席重新审查 1960—1963 年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议的所有决议。

1966 年 6 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仍然允许加诺兄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出席会议，但是苏哈托指定加诺兄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必须谴责 9.30 事件，必须承认加诺兄卷入其中，而且必须对屠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爪牙的做法加以肯定。

出人意料，实际上加诺兄已经准备好题为“合伙欺骗”的演讲词，演讲的核心内容完全不是苏哈托指定的内容。加诺兄演讲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对政权易手过程中产生的后果表示遗憾，但却受到军官们和伊斯兰教学者们的反对。

1967 年 3 月 7 日，临时人民协商会举行特别会议，会议主要颁布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议，要苏加诺总统卸任，并把国家领导权正式移交给苏哈托为代理总统，直至下一届大选产生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选出总统为止。就此，苏哈托已真正替代了苏加诺，也就在这时，苏哈托强调军队在国家中拥有无限的政治社会权力。（日后被译译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双重职能”）。与此同时，规定“建国五项原则”为国家的唯一准则。从那时起苏哈托便开始巩固他的势力，使政权集中在一人手中：即他本人手中。

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对苏加诺总统做出如下决议：

- * 认为苏加诺总统没有履行宪法上规定的职责。
- * 认为苏加诺总统没有实施国家方针，因此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定，从那时起
- * 直至下一届大选，禁止加诺兄从事政治活动。
- * 撤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根据 1945 年宪法规定授予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并任命第九届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守护者”——苏哈托为临时代理总统，直至大选选出新任总统止。
- * 临时代理总统服从于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并对他负责。
- * 涉及苏加诺总统的法律问题，根据符合现行法律来判定，并提交临时代理总统苏哈托执行。

苏哈托自 9.30 事件前直至解散加诺兄组建的内阁期间的总体行为，被外国观察家称为“隐蔽式政变”（或“爬行式政变”creeping coup）。其政变过程不是直接进攻和打倒敌人，而是隐蔽式地进行政变，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特色的政变。请看：政权更替后，加诺兄仍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身份。

当时以至今天，我看该政权的更替过程非常独特，除了独特之外，假如局势朝着反方向发展的话，对苏哈托本人也很危险。但是，看来苏哈托已深思熟虑，估计到一切。事实证明了他完全没有危险。而且苏哈托为了巩固政权，此后逐个撤消了他认为有助于树立苏加诺威望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议。

其实苏哈托并非要选择“隐蔽式政变”（爬行式政变），以爬行方式进行实属无奈。苏哈托不可能轻易爬上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他必须越过高级将领们和面对当时还很强大的加诺兄。

翁东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被逮捕后就被关押，我在特别军事法庭受审时被指控犯颠覆罪而判处死刑。所有对法庭作出判决后应有的法律渠道，例如上诉或要求撤消原判等程序，有意被关闭。因此，无论我服不服必须接受判决。显然，当时我受到巨大的打击，从共和国“第二号人物”的位置，突然之间成了罪犯被审判并处于死刑。

最初我在万隆芝玛墟监狱服刑，在那里聚集了和我同命运的人们（被指控卷入 9.30 事件的罪犯）。其中就是 9.30 事件真正的指挥官翁东中校，虽然不是同一个牢房，但我们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长达几个月之久。我和翁东同样被判死刑，无论是我活翁东都没有给予我们向更高的司法机构申诉的权力，即上诉，更不用说向最高法院要求撤消判决。

直到 1966 年底的某一天，好几个狱吏把翁东从牢房里接出来，并告诉他即将处死他。这是翁东人生道路的最后时刻，我和翁东自关在同一个监狱以来关系已非常密切，我们真正陷入忧伤的困境中。我不仅受到触动，而且也感到茫然，悲伤，甚至恐慌。因为阿哈玛德·突尔玛威尔（Ahmad Durmawel，审判我的军队检察官）当时告诉我，四天之后将处决我。我记得当时的日子是星期二，这意味着我将在星期六被处死。

当翁东被接走离开监狱之前，我有机会会见他。像通常将走向刑场的人那样，当时他已经被问及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也许因为翁东正处于恐慌，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翁东也得知我将于星期六被处死。因此我和翁东的会面确实很特殊。我们穿着囚衣，的确确面对面，我们心乱如麻。翁东即将被处死，而四天后就轮到我。

当时翁东有句别离的话至今我仍记得，而且我记得当翁东向我道别时那宁静的气氛。狱吏和军人们阴森森的面孔始终警戒地看守着翁东，远距离监视着我们，但他们似乎也体谅并给翁东最后的机会向我作出临终嘱咐。

翁东这样说：“班兄，再见，别难过，四天后我们在那儿见面”。他一边说一边往上指，翁东声音颤抖，双眼含泪。这位英勇的军人没有哭泣，但我了解他处于恐慌的状态，他确实没有料到苏哈托会背信弃义。

假如回头看看之前的一些日子里，翁东经常对我说，苏哈托不可能背信弃义，因为他是苏哈托的好朋友，并说苏哈托知道 9.30 整个行动计划，甚至提供部队支持，因此他深信苏哈托不会背叛他，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告终。对翁东的话，我无言以对，我只能点点头。看守我们的狱吏和军人们目击了这简短而令人忧伤的全部场面。

临近傍晚，在特别严密的监视下，翁东走向大门离开了芝玛墟监狱，我注视着翁东离开监狱。他坚定地走，也许他很快能控制住忧伤，也许他听任真主的旨意，他的人生道路到此结束。后来我听说翁东是在万隆郊外的一个村子被处决。我已经没有时间去伤心，去思考翁东的命运，因为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即将结束。当想起这些日子的时候，我想象着翁东在离开监狱之前向我道别的话，他落空了，因为事实上在那个世界里，他并没有见到我。

说实话，翁东被处决后，我的确很焦急。有哪个人不会怕，假如他的死期已定下来。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女皇伊莉莎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向苏哈托发了电报，过几天后，我从一位提供消息的人士得知此事。两位超级大国高级官员的电报内容，也不可思议的雷同。

信的主要内容是：“不要枪毙苏班特里哟。我知道他没有卷入 9.30 事件”。这不算外国干涉，对我来说没必要再去考虑。很早以前，印度尼西亚就一直遭受外国的干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极度惊慌中，他们帮了我的忙。而且事实证明，那简短的电报有巨大的威力，最后我没有被处决。

关于两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准确知道此事的，只有他们两人。我从未求助于他们，从逻辑上说，我也没机会向他们求助，尤其向别国领导人。可以计算一下，我被告知将被处死的日子大约是五天之前，在等待期间，我除了惊慌还是惊慌。

而且，我以什么方式向他们求助呢？我关在监狱里，而且是在特别严密的监视下，尤其临近处死的日子更是如此。然而，别忘了，我过去是外交部长，我和他们俩的关系密切。当讨论有关解放西伊里安和执行其他任务时，我曾多此和两国官员有过接触。

我的个人生涯

假如有人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何被控为 9.30 事件的幕后操纵者？那么，我反过来要问，是谁指控的？假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幕后操纵 9.30 事件，是由艾地策动的，那么，印度尼西亚成为血的海洋，而不是仅仅像发生过的流血事件那样而已。可以设想，有三百万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加上有一千七百万成员的下属组织，去对付只有几十万军队，这样的战争是何等可怕。假如真的擂起战鼓，战斗将何等剧烈。

然而，正如我们目睹的，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屠杀时，并没有作出相对的反抗，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反抗的指示。艾地都要逃难，后来还被枪毙了。恐怕可以这样说，加诺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榜样，他没有下达任何命令。

后来我被指控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指控或被诬陷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牵连的人，不只是我一个人。许多苏哈托不喜欢的重要人物都被指控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是有政治目的，是为了使苏哈托政权得于永恒。对我的指控更卑鄙，我不仅被指控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且还给了我刺痛我心的绰号“杜尔诺”（Durno 译注：爪哇皮影戏中的反面角色，用来称呼爱挑拨离间和爱诽谤的人）。苏哈托集团把我作为他们要消灭的目标，其实我只是作为中间过度性目标，他的首要目的是打倒加诺兄。正如我曾提及的，苏哈托夺取最高权力的方案分四个阶段。

- 第一，铲除成为强有力竞争者的军官们，如亚尼和纳苏帝安（这在 9.30 事中实现了）；
- 第二，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是和加诺兄有密切关系的大党（这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指控为 9.30 事件幕后操纵者以后就实现了）；
- 第三，把加诺兄和他的追随者分隔开（当逮捕了十五位部长，包括我，大约于 1966 年 3 月 11 日命令书出来一周后，这个目的达到了）；
- 第四，三个阶段目的达到后，通过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决议，采用似乎符合宪法的手段轻易地打倒加诺兄。

瞧，我属于第三阶段的目标，我和十四位部长一起，没有明确的理由而被捕。起初，军队还以比较有礼貌的方式逮捕我。“对不起您，我们受命保护您，以免因人民愤怒而可能受到伤害”逮捕我的军队说。接着，我们十五位部长被集中在 Senayan 附近的一个厅里。

几天之后，我们才醒悟过来，我们不是受到保护，而是被逮捕。军人们开始动粗，最后我们被关进监狱。为了破坏我们的名誉，苏哈托指控我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牵连，甚至还给我加了一个“杜尔诺”的绰号。苏哈托为了达到篡夺政权的目的，我们在监狱里受到侮辱和身心折磨。

我确实曾在政治组织里积极活动过，那是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里；至于共产党方面，我绝对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或其同情者，虽然在我权力最高峰兼任三个非常重要职务时，许多印度尼西亚共产人来接近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接近加诺兄，甚至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领导人也成为内阁成员或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成员。

为了更加明了，我阐述一下我的简历。我出生于已于 1914 年 9 月 15 日在东爪哇省的 Kepanjen (玛朗市南部) 我的父亲叫古萨迪 (Kusadi)，是 Kepanjen 的村长，我的母亲叫莎碧拉 (Sapirah)，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我成长

在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家庭里。当时在小小的 Kepanjen 村里，以我爸爸的地位来衡量，我们家庭是相当受人们尊重的，我的童年都是在 Kepanjen 村度过的，我在那里读完小学。

小学毕业后我到玛朗市进了 MULO(相当于初中)学校，因为当时 Kepanjen 村里还没有中学。初中毕业后我接着在玛朗市上了 AMS（相当于高中），1928 年高中毕业。因为我上学比较早，所以十四岁就高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去雅加达医学院深造，校址就在 Salemba 街，后来改为印度尼西亚大学。当时我的确想当一名医生，按当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标准来衡量，这可谓是相当高的一种理想。当时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最高只读到小学，我能上中学是因为父亲是个长官，虽然只是乡村的长官。

然而，我们五兄弟中，只有我在学习上最突出，所以我能继续上医学院深造。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认识了许多有志青年，包括加诺兄，我经常参加他们的各种讨论会，从此他们也认识了我，我自己也有兴趣和他们交往。

我按时完成了医学院的七年学业，实现了当医生的愿望。接着我又取得腹腔外科手术专业证书，并在三年里如期完成了该专业，因此 1938 年我就获得外科手术大夫称号。当时内科医生数量相当少，更不用说外科手术医生。不错的话外科手术大夫只有五人，三位雅加达的，包括我本人，还有二位是泗水 Airlangga 大学的。

毕业之前，1936 年我与芙茹丝蒂亚蒂（Hurustiati）结婚，她也是大学生，但和我不同系。我毕业时，她还在学习，我们的年龄只差几岁，我比她大一些。

我一毕业就直接被殖民政府聘用，在三宝垄（现在的 Dr. Karjadi 医院）当专科医生。但几个月后，我又被调到雅加达（现在的 Dr. Cipto Mangunkusumo 医院），当时那里的外科手术大夫连我在内只有两人。为了延续上大学时参加讨论会的兴趣，我加入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短短几个月后，1940 年我就当上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副主席。

后来我离开了医院，但我也没有私人开业，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从未开过私人诊所。我的医生生涯到此结束，因为我自己单调的工作感到厌烦，我对社会活动更感兴趣，直至最后加诺兄庄严宣告独立宣言。

大约 1946 年，苏加诺总统指派我为印度尼西亚政府驻英国代表，驻地伦敦。任命来得突然，没有经过什么程序，例如先当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等，也许由于当时的人选没有现在多的缘故吧。我接受了苏加诺总统的指派，我的夫人也同意了。

这职务其实就是大使职务，由于当时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所以无论在印度尼西亚或在英国没有人称呼我大使，加诺兄只称我的职务为：印度尼西亚政府驻英国代表。赴伦敦之前我有些迟疑，但是抵达英国后受到英国政府的接待，我抵达时确实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我也未曾想过要受到欢迎，紧接着我在伦敦设立办公室，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英国早期的大使馆，这是我从事艰难政府工作的开始。

假如有许多人把担任大使职务当作流放岗位，我却从这个岗位开始了我的从政生涯。

直至 1950 年，他们才称我为印度尼西亚驻英国伦敦大使。实际上对我来说没什么变化，只是改变称呼而已。但是英国政府后来对我的反应逐渐朝积极的方面变化，我经常应邀出席皇室活动，他们对我就像对待其他来自独立国家的大使们一样。

由于我经常应邀出席皇室活动，所以经常接近伊莉莎白女皇。我当时没有想到，因为接近伊莉莎白女皇，以至后来她能挽救我的生命，当时我只剩数日余生，坐以待毙（此事我已在前面叙述过）。我只不过是执行了国家任务。而在执行任务中，必须出席上述的礼仪活动。

1945 年苏加诺总统把我从伦敦召回，并调我到莫斯科。我正式的新职务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驻地莫斯科，在那里两年。后来我又受命调回雅加达，回到祖国，总统任命我担任外交部秘书长，代替鲁斯兰·阿布杜勒卡尼（Roeslan Abdoelgani）。而鲁斯兰替换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担任外交部长。奇怪的是阿里降职，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驻地华盛顿。

一年后我被加诺兄叫去，见了他以后，加诺兄这样说：“班特里哟，我指定你任总理”，我感到惊讶。从外交部秘书长提升为总理，这是一种跳跃式提升。面对此事，我要求给我时间考虑。

最后我谢绝了这个邀请。我对资格老的同事感到不好意思。说实在，我感受到加诺兄对我有好感，他对我的赞赏是基于我常帮他拟演讲稿。有一天，加诺兄要在联合国总部演讲，他上讲台之前，要求我替他拟讲稿，其实我当时身处雅加达，但这个任务我仍然完成了。虽然我很少和加诺兄会面，但可以感觉到他对我有好感，我则觉得自己未能胜任总理职务，况且我刚回国不久，对局势的发展缺乏了解。

然而拒绝加诺兄的好意，我也感到不安。后来我找到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主席苏威托（Suwito），求他向总统说明我的难处。一方面表达我的想法请求，另一方面推荐汝安达（Djuanda），加诺兄同意了。因此，汝安达就担任了总理职务，为了执行其任务，他得到冠以副总理主席团之称的两位副总理的协助，即伊特罕穆·卡里德（Idham Khalid）第一副总理和哈尔迪（Hardi）第二副总理。而后我当了外长接替鲁斯兰（Roeslan）。

汝安达逝世后，加诺兄叫来了三位部长，我本人，粮食部长雷门纳和青年部长查鲁尔·沙雷，目的就是三位部长中选出汝安达的接班人。选举的过程很独特，因此使我难于忘怀。

加诺兄发给我们每人三根火柴，起初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加诺兄表示这是公平而且民主的选举。每人发给了一根完整的火柴，半根无火柴头的（因为已被加诺兄折断了）和另外半根带有火柴头的（也是事先已被折断），加诺兄在桌上放了一个袋子。

做法是：完整的火柴根象征着我，半根无火柴头的代表雷门纳，而半根带有火柴头的代表查鲁尔。加诺兄要求每人只选择其中一个把他放进袋子里，火柴根放进袋子时，必须握在手里，不让别人看到。

选举开始了，我把办根没有火柴头的放进去，意思是我选雷门纳，紧接着雷门纳和查鲁尔。虽然形式很简单，但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总理的选举方法。气氛宁静，加诺兄注视着每一位部长把火柴根放进袋子，直到所有人都使用了各自的选举权。

结果怎么样呢？加诺兄把袋子里的东西开诚布公地倒出来，看到的是一根完整的火柴，半根无火柴头的及半根带火柴头的，样样齐全，加诺兄摇摇头，选举结果三位候选人得票一样，选举因此停滞。我们互相注视着，后来我们都相互公开，我选雷门纳，相反雷门纳选了我，查鲁尔选他自己。

后来雷门纳说：“最好苏班特里哟当总理”。他的理由是，印度尼西亚在外交方面需要给予全身心的关注，尤其牵涉到尚未明确归属的西伊里安问题，为此需要国际外交。他说：“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苏班特里哟”。加诺兄显然同意并叫来副官萨布尔（Sabur）准将在国家专用信笺上写下这个决议。

在贯彻执行之前，我要求发言。我说不必要变动内阁，加诺兄除了总统职务外，最好兼任总理，并由几位副总理协助，那么副总理就是我们三人，加诺兄也同意了。然后雷门纳就随意指派，我任第一副总理，雷门纳任第二副总理，查鲁尔任第三副总理。令人惊奇的是，没有更多的争议，大家都同意了。

事后不久，又赋予我另一项任务，即担任中央情报部长，因此我身兼三职。从此更显示出总统对我的信任。虽然担子够重，但是我完成了赋予我的任务，我还有假去麦加朝圣。

作为回报，除了薪金，还赏给我雅加达市中心 Menteng 地区 Iman Boniol 街 16 号的一座相当大的房子。按当时的标准，这房子称得上豪华，也就在这座房子里我拥有自己的图书室，但这个图书室后来被新秩序当权者所破坏。

1958 年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取名叫布多约（Budojo）。显然这是我唯一的孩子，因为他再也没有弟妹了。

时值我当上国家高级官员，有件奇特的事情，我成为好几位官员儿子的割礼医师。事情是这样，官员们都知道我是外科手术医生，当时其实已经有许多外科手术医生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求我帮他们的儿子行割礼。我已经为好几位官员的儿子行割礼，我只能真诚的帮助他们。

我自从医院辞职后，未曾开私人诊所，好几位朋友为我自己不开业而惋惜。当时医生的数量还很少，但是，由于我已拿定主意从政，我离开了本来适合于我所学专业的工作领域。是呀，我必须选择，而且我已经作出决定。结果，我只能成为官员孩子的割礼医师。

在我担任国家高级官员期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我关系密切。作为政府官员，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关系当然密切，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其他重要人物也一样，但是我没有加入他们的党。自从成为国家公务员，我也没有参加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活动了。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个大党，他们自然拥有特定的政治抱负，因此他们不仅仅接近我，而且也接近其他国家高级官员，包括加诺兄在内。

甚至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进入内阁各部门，也有许多参加了武装部队，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确是个大党而且是合法的党。因此，他的重要人物参加内阁和武装部队也很自然。

举个例子，当今的某个大党（我不必指名），在内阁各个部门安排了他的重要人物，甚至有的参加了各级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这不是也很正常吗？而且，假设他们的领导人接近高层领导，总统及其亲近，也很正常。可是当宣布这个党被禁以后，情况就变得不正常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这样。

当 9.30 事件爆发时，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当时我正在棉兰执行任务，我们到基层巡视有关巩固政府的各项纲领。我一接到总统的通知立即赶回去，并于 1965 年 10 月 3 日抵达茂物总统府与苏加诺总统会合，此以后国家状况不稳定。自 1965 年 10 月 2 日苏加诺总统便在茂物总统府成了苏哈托的俘虏。

也是从那时起，苏哈托影子集团极力宣传 9.30 事件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幕后操纵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中爪哇被处决，然而却出现了艾地的书面自供状，承认 9.30 事件是他幕后操纵的。此事很可能是一种策划操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也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就被处决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闭口不言毫无申辩余地。1965 年 10 月 1 日，艾地确实在哈林（空军基地）9.30 事件部队集合点。但是我听艾地夫人说，1965 年 9 月 30 日晚上，艾地是被绑架并带去哈林的。加诺兄离开哈林后不久，艾地飞往日惹市。

我确信 9.30 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不是艾地。我记得我和艾地一起看望正在病中的加诺兄时的情景。经我检查后，实际上加诺兄只是得了感冒而已。但是却传出加诺兄病重并至少会瘫痪的流言。这些传闻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外的公众的一种宣传。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肯定了解实情，艾地和我一起去看望加诺兄的。这些宣传将激发公众舆论，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考虑到加诺兄得“重病”，抢在对方行动之前采取夺权行动。

知情者只有加诺兄，艾地请来的来自雅加达 Kebajoran Baru 的中国医生，雷门纳和我本人。我不是存心要替艾地辩护，但我坚信不是艾地幕后操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因为我精确了解情况。假如说艾地支持屠杀将领委员会的行动，那是有的。传说将领委员会的行动成员将对总统发动政变，因此要先下手对他们进行屠杀，有一次，我听到艾地表示对此是支持的。因为一旦军人集团推翻总统的目的成功，那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今后的前途将非常艰难，但是艾地仅仅是口头说支持而已。

但是，后来苏哈托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成功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 9.30 事件幕后操纵者”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大众的脑海里。更有甚者，他们编造“一群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译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一边乱舞一边虐待将领们”的传闻来“充实”在鳄鱼洞被屠杀的将领们的遭遇。传说将领们的眼睛被挖出来，生殖器被割掉，身躯被削得一片片。这种卑鄙的虐待行径却冠以“花香典礼”，这样一个与卑鄙行为完全相反的名称，的确是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传闻通过一位自称是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成员，名叫啞米啦（Jamila）的妇女和她的同伙们的自供加以强化的。我不知道啞米啦是什么人，但这传闻是由苏哈托操控的媒体发布的。霎时间，人民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怒火被点燃起来。

其实，苏哈托散布的传闻全部都是假的。事实证明，苏哈托倒台后，过去曾经解剖过将领们尸体的医生们在电视上说：“那些将领的尸体是完整的，完全没有被虐待的痕迹，尸体的确有脱皮现象，但根据调查，那是因为那些尸体已经泡在井里好几天的缘故。”

我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1965年10月中旬，我确实曾呼吁过陆军停止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成员的屠杀，那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屠杀之初。我的呼吁是基于苏加诺总统的指令，不愿意看到流血事件的发生。当时苏加诺总统还掌握政权。

9.30事件爆发后数小时，他下令所有部队就地戒备，没有总统的命令不要采取行动，因为加诺兄根本就不愿意有流血事件发生。然而总统的命令他们不予理睬，我的呼吁也没人理会，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屠杀一直在继续。

从此后我被扣上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帽子，况且我曾经被派到莫斯科任职，我也曾经作为外长被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访问，而中国领导人又提出免费提供援助武器装备的建议。从我执行一系列国事任务中，他们就给我扣上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帽子。我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对扣上的帽子，我当时无法作出更多的反应。因为所有这一切还不是因为我执行了国家的任务吗？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斩尽杀绝后，我觉得被扣上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帽子令我毛骨悚然。1966年3月11日在总统府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我成了军队暗杀的对象，虽然我当时还是国家官员。当总统府被可玛尔·伊特里斯领导的陆军战略预备部队以及得到沙尔沃·爱逊领导的陆军突击兵团（即后来的特种部队）的援兵包围时，很明显，我是他们盯梢的目标。从情报部门的报告，我得知可玛尔·伊特里斯和他的部队要谋杀我，这也是苏哈托批准的，但最终我逃脱了。

几天之后，十五位部长，包括我在内，才被逮捕，如果说原先给我扣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帽子还没有公开的话，自我被捕后，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帽子便传得越来越广泛。更有甚者，苏哈托还给我取了个新的绰号：“杜尔诺”。作为爪哇人，给我取这个绰号，当然非常刺痛我的心，因为“杜尔诺”在皮影戏里是奸诈，不诚实的人物，也是喜欢挑拨离间的人。有关取这个绰号的来龙去脉我也不清楚，此事肯定只有苏哈托才知道。但是，这的确是为了毁掉我个人作为加诺兄的忠实追随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给我取“杜尔诺”绰号是始于我被拘留以后，即加诺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之时。

在监狱里，我完全没有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但是精神上的折磨确实非常明显。没完没了的审讯，目的就是为了摧残我的精神。作为前国家高级官员，当时我精神上已崩溃，从国家掌权者变成了囚犯，我非常压抑。我的妻子肯定也有同样的遭遇。我唯一的孩子还年幼。

不久后，我在高级军事法庭受审，但奇怪的是，不是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卷入9.30事件”的罪名指控我，完全没有涉及这两件主要问题，其实，我已被扣上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帽子，并给我取了绰号：“杜尔诺”的绰号。

我受审是因为我讲的话会引起社会混乱，我当时说：假如有恐怖，必然将出现反恐怖。9.30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被陆军利用的青年们施加压力使加诺兄受到审判。他们

得到陆军的支持举行示威游行，并针对加诺兄及其支持者搞恐怖活动。有一次我曾说过，如果有恐怖活动（来自青年们），势必会出现反恐怖（不知来自何方）。

瞧，我这句话被人为会引发骚乱，我被指控搞颠覆活动。开庭时间很短，我被判处死刑，真是法庭丑剧。在 1966 年 3 月 11 日内阁会议上，他们以公开的方式要谋杀我，失败了，可他们却上演这种法庭丑剧，以“依照法律”的方式来杀害我。我要求上诉和要求撤消判决仅仅是为避免死亡的一种反应，然而这种循法律程序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审判过程本身就是一出丑剧。

而且在苏哈托掌权初期，围绕 9.30 事件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许多案件，在法庭上的一出出丑剧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从那时直至今日，法庭丑剧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围绕 9.30 事件出现的法庭丑剧变成了以后很长时间内一系列法庭丑剧的楷模，司法机构的道德严重败坏，各种案件的审判继续“被搅乱”：Tanjung Priok 事件，Lampung 事件，批评新秩序政府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等案，都参照 9.30 事件的审讯办法进行审判，甚至各种腐败案件亦如此处理。谬误变成正确，正确的变成谬误。

这绝不是我对苏哈托发泄私仇。还有，瓦希德总统（与我没有任何联系）甚至提出雅加达的所有法官要全部换成“进口”法官。

在监狱里，起初我曾经很沮丧，认为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成为加诺兄的忠实追随者。但后来我并不为此后悔，因为这是我的决心，是所有从政的人的风险。

我被关押在单人囚犯隔离室，和其他囚犯分开。虽然肉体上我没有受到虐待，但有人在幕后操纵把我搞到如此地步，以致我的精神确实受到伤害。恶劣的监狱条件，使我的腹部有段时间受伤并发炎。我知道，这只需简单的药物治疗，但是，政府没有提供，使我的伤口任其细菌侵蚀而腐烂。当我的伤口确实严重的长了蛆，才给我治疗，看来迟迟才给我药物是有意的。结果，伤口是愈合了，但是至今留下后遗症，经常发作，疼痛难忍。

在牢房里，我被禁止书写，阅读新闻，亲友探访（数年过后才允许）。我唯一的读物是古兰经。然而，这读物好像把我带回童年时代充满宗教气息的氛围里。我甚至于感觉到时任国家高级官员时未曾有过的心灵上的平静。

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英国的高层官员的电报，使我最终躲过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但是，我从沙冷巴（Salemba），芝玛墟监狱开始，直至芝碧囊（Cipinang）监狱，始终被关在单人囚犯隔离室里。

1978 年我的孩子布多约由于心脏病发作离开人间。他的母亲真正经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自从我被判刑，只有布多约能使他的母亲坚强地面对考验。从一位国家高级官员的妻子，突然之间变成“杜尔诺的妻子”，紧接着唯一的孩子离开了人世，因此几个月后，我的妻子随布多约而去了，只剩我一人，孤单单地在牢房里，再也没人来探访。

可是，有一位妇女悄悄地同情我。她是邦庞·苏伯诺（Bambang Supeno）上校的前妻。邦庞是按照苏哈托指示跟着支持 9.30 事件的陆军高级军官。但是，和其他 9.30 行动执行者的命运一样，邦庞被判刑并最终离开人世，他的妻子丝莉·姑丝蒂安·蒂娜（Sri

Koesdijan Tinah)，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孀，后来对我表示同情，最终我们于 1990 年在芝碧囊监狱结婚。我对丝莉愿意和囚犯结婚非常钦佩，非常罕见有像她这样真诚的女人。

我不再是一个人生活。虽然我仍蹲在特殊的单人囚室里，但是，自从好多年没有人来探访后，每周又有人来探访我。正当我对生活失去信心时，丝莉出现了。她每周带些我喜欢吃的什锦饭（Nasi Rawon）给我吃。丝莉的两个孩子也很关心我。我们同样都是苏哈托的牺牲品，走到一起了。我顿时醒悟过来，苏哈托暴行的受害者不仅我一个人，还有许多其他受害者远比我更艰难。丝莉真的使我的生活重新充满阳光。

1995 年 8 月 16 日我被释放了，我和丝莉及孩子们一起回家。我们住在我过去留下来的 Iman Bonjol 街 16 号的大房子里。我像早晨从睡梦中醒来似的，三十年在黑暗的牢房里，好像重见了晴朗的天空，我跪拜感谢真主，仍给我自由呼吸的机会。

在那房子里我们住了一年，因为养护费很贵，应付不过来。作为一所私立高等院校的一名讲师，丝莉的酬金不多，而我是个失业者，没有收入。我在苏加诺总统时代担任三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却完全没有得到尊重，我没有享受退休金。最后我卖了那套大房子，作为置换，在雅加达南部买了比较小一些的房子。

苏哈托倒台后，好多人来见我，建议我写回忆录。其实我不感兴趣，除了没有考虑成熟外，对我来说，揭露过去的事没什么好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我已经服刑三十年，我已经遭受侮辱，称我“杜尔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等等，我已经承受这一切。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已经是夕阳西下了。为了真主我只有多多厉行善举，作为将来有一天见真主时的见面礼。何况苏哈托最终也倒台了。假如我揭露过去的事，我只会沉缅于伤痛之中。因此，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然而，同一辈的朋友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都一直和我联系，有的通过电话，有的直接和我见面，他们说，9.30 事件的历史已经被歪曲了，我应该为纠正历史说出事实真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这不是为了你，但是对年轻一代很重要，不要让他们被篡改的历史所蒙骗”。

传出的消息说：9.30 事件非常重要的扮演者之一，阿布杜勒·拉迪夫上校也写了一本为过去辩护的书，但有人猜测拉迪夫并没有全面揭露神秘的 9.30 事件。因为，香港出版的 1990 年 8 月 2 日“远东经济评论”报导，拉迪夫完整的回忆录存放在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一所银行并有嘱咐，假如拉迪夫被杀害才可以公布于众。这意味着 9.30 事件仍然还是很神秘。

我感到忧虑，我原先想埋藏往事的意愿好像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尤其是许多著名作家来见我，准备写我的回忆录。在焦虑中，我记起一位最经常采访我的青年记者，我找他并请他写我的事，因为我信任他，他也同意了。他是这本书的编辑，有我和他两人编辑出我所经历和记忆中的事件片段。

我意识到本书也许会有许多不足之处。请谅解，9.30 事件是陆军的内部事务，我不是来自陆军，但是我是 9.30 事件历史事件中亲身经历过的一分子，目睹了事件发生之前，发生之时，直至事件产生后果的全部过程。也许这也就是我的奉献，是

我厉行善举的一部分，以便成为我将来后世的生活数据。但愿会有他的好处。阿门。

六 后记

恐怖，恐怖，又是恐怖，从不间断，一个接一个，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自从1965年开始，并于1972年大选后得以继续的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要经受的恐怖。为了巩固苏哈托集团的统治，他们继续大肆宣扬，高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潜在危险。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新秩序当权者始终要为人民制造假想敌，即可怕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潜在危险。这就是精神上的恐怖。至于对常提出批判的群体，比如大学生们，则对他们施以精神和肉体上的恐怖待之。

1966年苏哈托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发动大学生，然而在他执政期间，却反过来又对大学生采取恐怖手段。对那些不满和喜欢示威游行的大学生，采取逮捕，审讯甚至虐待他们。

七十年代中期已经有许多批评苏哈托家族贪婪轶事流传民间。比如，在大学生中间给苏哈托妻子西蒂·苏哈蒂娜(Siti Soehartinah 平时称Tien夫人)取绰号，称其为“Tien百分率夫人”，意思是，百分之十夫人。根据他们说，Tien夫人经常向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投资者索取百分之十佣金。

新秩序集团使用恐怖手段。似乎在显示他们屠杀成百万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同情者之后的强大实力；似乎在宣告：别对当权者胡来，别企图反掌权者。同时又把来自年轻一代的批评看成反抗当权者，因而必须把他们消灭。

我们都目睹了构成这个结论的许多事实，看到新秩序集团是如何扼杀社会批评的过程。从1971年大选的恐怖活动开始，继而对1974年1月5日（即著称的“Malari”，Malapetaka Lima Januari，1月5日灾难的缩略语）示威游行的大学生进行的大逮捕和虐待；紧接着，军队对1978年示威游行的大学生进行镇压，1984年在Tanjung Priok伊斯兰教徒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屠杀，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遭到武力镇压。

我获得自由后，苏哈托从权力宝座上垮台了，但暴力仍遗留在这社会，破坏着这社会。我从大众媒体看到东加里曼丹沙姆巴斯(Sambas)的群众械斗，展现在人前的大屠杀令人毛骨悚然。

报刊上登载了人的头颅被丢弃在马路边的照片，东爪哇巫师的传闻更为疯狂，被砍断的头颅，插在削尖的毛竹上拿去绕城示众。在玛朗，离我出生地不远处，被斩断的头颅在摩托车后面拖着游街。我这后部分提到的事不再是军队所为，而是发生在百姓中间。所有这一切是过去极端残忍屠杀共产党人留下的后遗症，给下一代留下极坏的影响。

“隐蔽式政变”（爬行式政变）是沾满了鲜血的政变。第一，是1965年10月1日被杀害的将领们的鲜血；第二，幕后有人策划操纵的翁东和苏巴尔约的鲜血；第三，被人出卖的Sjam Kamaruzaman的鲜血；第四，成百万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共产党的同情者及他们的家属，工人和农民的鲜血。

尊敬的读者们，知道人性的罪孽而不去制止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种罪恶。那么，直至我写这本书时，我还在想，苏哈托得以逃脱惩罚的地方在哪儿呢？苏哈托说：“我在医院（Gatot Subroto 陆军中央医院）直到临近午夜，然后就回家”。

即便我们试图忘掉苏哈托讲的是谎话片刻，然而当确实了解到数小时后将领伙伴们将遇到危险之后，他可以回到家里倒头睡觉，无论如何，这就是罪过，屠杀了成百万人并造成另一部分人长期在监狱里煎熬的苏哈托，对其犯下的罪行，理应给他颁发怎样的“资格证书”呢？什么“资格证书”呢？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毁灭性的打击及随后对成百万人的屠杀是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尤其是自称是民主国家的美国。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这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里大规模的摧毁组织才有的方式，此前任何人也未曾想象过其残暴程度，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我在内的当时直接目睹事件全过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精英阶层。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的内部事件，而且是印度尼西亚和世界的事件。这是存在已久的强大无比的国际帝国主义为一方与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为另一方之间由于矛盾冲突引起的大事件。印度尼西亚只是事件的发生地，而就其特征而言是全球性的。从道德观念来讲，这罪行是人类文明的一场悲剧。这个事件的逻辑结果就是导致国民生活法西斯化，这是与现代理论家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所有这一切后果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转播，包括传入印度尼西亚。但是印度尼西亚却不同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的传入并没有伴随着中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在这里并没有实现这些。因此，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在这里出现了军事官僚政治。随着其发展还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接班的一代难于克服的民族问题。

另一方面，对人类和人道的罪行保持沉默的态度必须立即结束。我以朋友们及我的家人和亲属们的名誉，以所有被杀害的民族之子的名誉，以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名誉，以多年来跟随母亲坐牢的孩子们的名誉，以被苏哈托集团虐待和残杀的任何阶层的名誉呼吁，结束这种沉默。对于自以为是民主主义的人们，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请你们打破这种沉默。天色不早了，太阳已经升到我们的头顶上了。

苏哈托集团的生存是由一小撮印度尼西亚社会名流，法西斯将军们，及支持他的民间人士和技术专家，以及后来已被证实贪得无厌的企业家支撑起来的，三十多年来他们以十八世纪那种不人道的发展资本主义模式来加速印度尼西亚的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步入新起点，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我感到自豪，因为这个起点是面对犯罪势力和新秩序集团贪污所得的钱财都毫不动摇的印度尼西亚青年一代开创的。纠正三十多年来被他们歪曲了的历史，打破沉默。

2004年3月11日 译于 厦门